

第一章 在祖国的大地上

出身贫苦，立志报国从军；升为高官，不忘救国救民；创办学校，革除封建迷信；矢志抗日，终生奋斗不止；痛恨腐败，各地针砭时弊，大声呐喊，永为民众利益；伟大将军，永在民众心里。

开封除旧布新

1922年，直系军阀曹錕、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张作相等，为了争权夺利，发生了直奉战争。当时的河南省督军赵倜在1920年直皖战争时，曾勾结曹、吴打倒了皖系军阀段祺瑞。在1922年直奉战争中，他却倒向奉系军阀张作霖方面，向郑州出兵，抄直军的后路。吴佩孚急电陕西督军冯玉祥出兵潼关，向郑州推进援助。冯将军即向郑州挺进，与赵军激战两昼夜，终将赵军击退，冯乘胜前进，直逼开封，将赵倜赶走。曹、吴即请委冯玉祥担任河南省督军职务。

开封是河南的省会，在1922年以前，经历了昏暗腐朽的官僚统治，整个开封乃至河南全省，都处于封建迷信的气氛之中，尤其经赵倜统治多年，政治黑暗，贪污腐化的风气更达到了极点。当时，我曾亲眼看过在阴历七月十五日城隍出巡的热闹景

象（传统旧习俗阴历七月十五是“鬼节”，城隍爷要出巡去镇压小鬼），也曾看见过“贞节女”抱灵牌结婚情景；又听说赵倜有位姨太太，是灵宝人，很得赵倜的宠爱，赵的手下都不敢称她为姨太太，而称呼她为“灵宝夫人”或“西屋太太”。当时开封警察局长车云，竟呈送她一双绣花鞋，鞋底上绣上“车云敬呈”等字样以表巴结之意，当即传遍开封，视为笑柄。另一怪事是在开封西大街有座“救苦庙”，至于里面供奉的是什么神，也记不清楚了，该庙的主持借此蛊惑人心以敛钱财，香火甚盛。有许多的“善男信女”到庙里祈福增寿。有次赵倜的小儿生病，赵倜的僚属竟有许多人为了巴结上司，到该庙祈祷，愿意将自己的寿命减下几年，以转添到赵的儿子身上，结果他的儿子寿命增添了100多岁，还是无济于事，仍然一命呜呼。当时政局一片乌烟瘴气，人民过着苦难的生活。冯玉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开封的。

冯玉祥一到开封，便将赵倜留守的城防司令宝德全予以正



冯玉祥与官兵一同劳动

我所知道的冯玉祥

法。宝德全原是“旗人”，在赵倜部下任师长，曾任归德（即商丘）镇守使，他在郑州战役中助赵攻冯，冯军损失颇大。赵败退后，宝在开封以城防司令之名义维持城内秩序，企图博得商民的好感。而冯知道他反复无常，作恶多端，即将其镇压以平民愤。当地百姓都知道冯将军执法甚严，推行政令无敢反抗者。自从冯来到以后，开封风气为之大变。

首先，他以身作则，提倡节约，作风简朴，自己穿的是粗布军衣、布鞋，吃的是一菜一汤，或者是大饼油条，虽然身为一省督军兼省长，与士兵生活毫无二致，真正能做到与士卒共甘苦。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官僚政客、富豪阔人，都过着享乐腐化的生活，看到冯这样朴素的生活就认为他是不近人情的，是假装的。不过不管别人对他如何评论与讥讽，但是开封的风气改变了，这是实实在在的。当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当时一般旧官僚们，都讲排场比阔气，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冯这样一来，原来穿绸缎的改为穿布衣了。一时做来不及，就去买旧衣服穿，所以徐府街估衣店的旧衣成了俏货。那时，一般求官谋差的人要是去见冯督军，都穿戴简朴。有一次冯给那位求见的人来了一个立正敬礼，把那位吓得不知所措，冯说道：“我不是向你敬礼的，而是向你的缎鞋敬礼的。”（当时穿皮鞋的很少，穿呢绒鞋的也不多，一般人都是穿着皂布鞋，只有一些阔人才穿缎鞋）。

其次，是在开封破除迷信。冯到开封即将“救苦庙”改成真正救苦救难的场所，将无家可归的、生活困难的穷人都送到“救苦庙”，在庙里维持生活。旧时官吏以数千年来的封建迷信说教、以神道说教来蛊惑人民，使之易于统治，而庙里住持则借此以敛财，冯将军为破除迷信，将庙里神像泥胎统统拆除。他拆除的神像并不只限于“救苦庙”，凡在开封庙宇里的神像，不管是城隍庙、关帝庙，所有神像一律拆除。规模较大、历史悠久的“相国

寺”大刹里的佛像也都被拆毁，其中有座八角琉璃殿，殿内周围塑有 800 罗汉，殿中央竖有木雕千手千眼佛，是名家作品，艺术价值很高。当正拆毁其他神像时，有一位外国的传教牧师愿意出 20 万元（银元）的高价将该佛买去，冯严词拒绝，将有艺术价值的文物保存下来。至于寺内的和尚们，也都给他们安置工作，从事劳动生产以自给。

那时开封城内还有一个土寨子，位于“龙亭”以北（龙亭据说是宋朝赵匡胤的宫殿），俗称“襄城”，里面住的全是“旗人”（即满族八旗）。在清末，这些人都是皇亲贵族之类的特殊人物，只要一生下来，就有按月发给的银子（这是清朝政府的一种制度，以表示优待贵族的一种特别办法）。这等“贵族”，从来就不事生产，专门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年代久了，养成一无所能的懒人。民国成立以后，这些“贵族”们的特别饷银津贴停发了，生活断了来源，日渐穷困，有的无法生活，堕落到去作些不正当营生。冯来到开封后便将土寨拆掉，把这些人安置起来，办起小工厂，教他们从事劳动，自谋生活。这件事我认为他开创了劳动改造人的先例。

4 其三，冯在开封严禁嫖赌。开封为我国古都之一，多年来又是河南的省会，在腐败的反动势力影响下嫖赌之风很盛，如第四巷、会馆胡同，都是娼妓聚居之地。冯来后，便将鸨母及其以下的佣人都安置工作，还将一些妓女配给那些从庙里赶出来的和尚结为伴侣。他禁赌的方法也是多样的，因此，能雷厉风行地从严禁绝。那时开封“打麻将”之风甚盛，尤其是所谓上流社会，冯即令从严抓赌。曾见到有四个赌徒被游街示众，令打牌的四人每人抬着桌子的一条腿，并让他们自己叫着“我打牌啦”，这样赌风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禁绝了。

其四，是提倡妇女放足，男子剪发。我们曾看到街上贴着标

语，“妇女要放足”，“男子要剪发”。现在要谈起这个问题，可能许多人不很理解，但是在以前的旧社会，这也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男子留发辫，是清朝入关统治汉人推行的一种制度，他们强制推行这一制度的时候，是杀了许多人的，年代久了就形成一种习俗，人民也安于现状就不愿意改了。民国成立已有十年，这陋习还依然存在，冯来到开封之后，即主张强制剪掉小辫，这是一件移俗的好事，是大快人心的。女子缠足是摧残妇女的，把好端端的脚缠成“三寸金莲”，使女子走起路来“步步生莲花”以供男子玩弄。这种残酷的恶俗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民国以后虽然也有提倡放足以解除妇女痛苦的规定，但也只是说在口头上，很难改变多年来的陋习。冯一向执法从严，对于妇女放足，也是认真强制执行。凡是发现的，立即解放。有次在街上有位妇女打扮得花枝招展，小脚裹得只有三寸长，坐在“人力车”上（那时开封的交通工具，也称为东洋车）。冯立即叫人力车停住，要车上的妇女立即将自己的裹脚布解开。此后开封妇女缠足的风气刹住了，这是他对妇女解放所做的一件大好事。

赵倜在河南多年，掌握军政大权，只知搜刮民财以供自己享乐，对教育事业极不关心。冯到开封，首先清理赵氏逆产作为教育经费，例如开封理事厅门前新建的赵公馆，就改为开封女中的校址。他热心办教育的事很多，最重要的一件是将河南的“契税”划拨为河南办教育的专款（契税即人民买卖房地产所缴的税），每年收入数百万元，从此教育经费有了保障，改变了以往教职员工因领不到工资而经常向政府“索薪”的现象。因为冯热心教育，为大家所深知，也有人借此投其所好从中敛财的。记得有一位牧师神父之类的人物，他知道冯信基督教，又热心教育，就向冯募捐，要办一所“培德”学校，冯即拨款捐助，后冯先生派余心清去调查，才知他办学是假敛财是真，冯便把他的学校取

消了。

冯玉祥一向思想进步，立意革新，一切为人民、爱国家的思想，在当时军人中是很少见的，从上所述我所亲自见到他的高风亮节，也不过是他生活中的点滴，表现出他为人民谋福利做好事。而他素日救国救民的抱负也是从这些细微小事中表达出来的。

当时吴佩孚在战胜皖系军阀段祺瑞之后，以直鲁豫巡阅副使名义坐镇洛阳（那时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住保定），飞扬跋扈，盛气凌人，其他各省的封疆大吏及一些军阀们，多向其效诚以示巴结。冯玉祥对这些卑鄙龌龊的行为是痛心疾首的。例如在直奉战争以前，吴在洛阳过“五十大寿”，各省的督军、省长，以及高级官吏，都趁此机会送厚礼以表示报效“吴大帅”，甚至清朝遗老、戊戌变法的头头康有为也亲自跑到洛阳为“吴大帅”祝寿，并写有“牧野鹰扬，百世功业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的寿联，极尽恭维之能事。其他官吏送的礼物，那就更不用说了。冯当时也算直系将领中的一员，他们之间素有来往，但并没有送礼物，只送一罐子白水，以表示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意。吴固非君子人也，对此虽无表示，但不快之情景当在意中，这从他对冯的报复可见。那时冯将赵倜驱走以后，任河南督军，若论功行赏也是理所当然，而吴却在此时向冯每月索20万元（银元）以作补助军费之需，冯决不在河南为吴搜刮民财，坚决拒绝，吴即怀恨在心，将冯调离河南，去担任陆军检阅使职务的空衔，以他的亲信师长张福来接任河南督军。冯从1922年5月到任，10月即离去，为期不到半年，所以其他革新的措施也无从实现，后来继任的张福来，乃昏庸无能之辈，河南人民又陷入其统治之下，惜哉！

（陈裕春）

建设新河南

20世纪20年代初，河南群众都知道冯玉祥军队的纪律好。当他做旅长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驻扎在信阳一带，已经在民间有所传闻。他的军队不强占民宅，不住学校，不欺压老百姓。

五原誓师后，冯由陕西进军河南，曾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在省政府内，设有一个宣传处。因北伐战争，各级学校都停办了。那时，我是师范的学生，还不到20岁，失学一年多。在学校尚未筹备恢复开学之前，我参加宣传处文艺股工作，因而有机会听冯玉祥讲课，知道他在河南的一些进步的为政措施。他在任内，经常到各个部门去视察，突如其来，事前不打招呼，只带一个随身卫兵。冯也到过宣传处文艺股，我和他单独见过面，也和他谈过话。经过回忆，我把他在河南任内有印象的一些事简述于下。

教育经费独立

北伐革命以前，河南的教育经费很不稳定，尤其在军阀互争地盘的时候，更为困难。冯玉祥到河南后，省立各级学校已经停办一年多了，他即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为了使教育经费有保障，他让教育经费独立，不受时局变动的影响。他把全省房、地产买卖的契税收入，作教育经费的专款，使教育经费独立。由省教育厅设立一个专管全省契税收入的机构——契税局。第一任局长是德高望重的林伯襄（解放后，任河南人民政府教育厅副厅长）。全省的契税收入款，照各学校规定的预算，按时拨付，使教育事业正常进行。这种制度，使教师们的生活得到相当的安定，教育工作得以正常进行，大家深受其德。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解放前夕。

兴建城北体育场

开封龙亭北面，原有一座“里城”。它是用泥土垒起来很低的土城墙，是清朝驻扎军队的营房。民国成立后，许多原居住在里城的满族人都迁到外城来住了。里城内原是一排排低矮的小平房，已经破烂不堪，住的没有几家人家了，景况十分荒凉。冯玉祥让他们仅有的几家迁到外城住，把土城拆除，利用这块荒地，兴建了一座体育场（那时叫运动场）。使全省运动会和开封市运动会会有个举行的地方，让体育运动有比赛的场所，让老百姓有锻炼身体的地方。这就是现在位于龙亭后面的体育场的前身。

兴建人民会场

在开封城内西北角，有一座庙宇叫“救苦庙”。这座庙宇的建筑虽不宏伟，除相国寺外，还算一座颇具规模的庙宇建筑。冯玉祥视察了这座庙宇，他在一次省府干部大会上说，救苦庙，顾名思义，应当救济苦人。所以他把一些居无定处的劳苦人安置到救苦庙去住。在大革命以前，有些所谓的“慈善家”打算扩建这所庙宇，也不知捐了多少款，从东北运来大批木材，都是上等方木，堆放在庙门前一大片空地上。冯玉祥利用这许多好木料，请来一位工程师设计，准备建造一座人民会场，地址选定在相国寺西边。这座建筑是三层楼，可容 1000 多人在场内集会。在当时算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了。解放后，尚使用许多年，后经拆建，成为现在的人民影剧院。

塑铸孙中山铜像

开封龙亭，旧时无人管理，只住有几个道士看管。冯玉祥把它改为公园。他请来一位法国留学的园艺家郭厚庵设计，并

在门前建了一座小型的水泥纪念塔（不久就被拆除了），在龙亭院内树立了一座孙中山铜像。原定名为“中山公园”。拆除了大殿中的一座神像，把道士视为珍宝的龙墩保留下来，免费任人参观。孙中山铜像至今仍树立原处，为全国有数的几座孙中山铜像之一。

建立美术陈列馆

开封相国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建筑群，内有一座八角琉璃亭，造型别致，别具一格。冯玉祥为破除迷信，下令把亭内周围泥塑的各色罗汉全都打掉，仅保留了亭中央的大型木雕千手千眼佛。经过整修，成为圆形的长廊。冯玉祥把它作为“美术陈列馆”。他曾请来一位安徽画家许士琪，为孙中山画一幅大型油画全身像，也为他画一幅全身像，陈列在入口处。其余则是陈列开封市各校美术教员的作品，还有省外画家的作品，如进步青年胡燮的作品，还有一幅近代知名画家潘天寿的水墨荷花等。开幕后，群众任意入内参观，不收门票。有新作品送来，就随时陈列。当时，我也有习作参加，还经常到那里去观摩。利用这一古址作画廊，既合适又别致。据我所知，开办美术陈列馆，也是首创的。解放后，八角琉璃亭经过两次翻修，把亭基抬高了1米多，规模更大，更壮观了。

建立革命烈士纪念塔

在开封南门外通向火车站的地方，在辛亥革命十一烈士墓旁，建造了一座相当高的革命烈士纪念塔。后因马路加宽，周围的房子拆掉一些，把这座塔留在马路中央，至今已经50多年了，塔基用青石砌成，塔顶高入云霄，仍然相当坚固。这也是冯玉祥缅怀先烈的纪念物。

修建鼓楼钟亭

古代的晨钟暮鼓已不适用了，开封钟楼早已拆去，只有一座鼓楼位居市中央。冯玉祥到开封后，为了让市民都具有时间观念，他利用这座高大的古建筑，在楼顶上开了个洞，修建起一座四面钟亭。夜晚通上电，白天黑夜都可看到时间。可惜，这座古建筑物已被战火烧掉了。

建立民族博物馆

1928年夏，冯玉祥决定在开封市建立一座民族博物馆，遂组织人力开始筹备。馆址设在现开封市博物馆，内容是介绍世界各民族的生活。当时，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专职绘制各民族生活的大幅布画。后因所掌握的资料不足，一部分雕塑无人能做，良好愿望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

冯玉祥到河南后，在行政方面也除旧革新。他要求省府各机关干部一律穿短装。夏季各发一套白斜纹布的中山装，冬季发蓝布棉衣、棉帽和棉大衣各一件。伙食由公家供给，饭食质量相当高。无论职位高低，每月一律发给维持费20元，这是一种半供给制的制度。严禁干部到馆子大吃大喝，严禁贪污受贿。干部都是兢兢业业地工作，没迟到和早退的现象。同时他很注意干部的身体锻炼和学习，以及文娱活动等。省府各机关干部，每天早5时半起床，在省府门前广场集合，跑步半小时，并调来军乐队伴奏。冯玉祥有时也参加，并带领大家一起做操。随后到礼堂（那时叫“中山俱乐部”）集体学习一小时。先学三民主义，继学建国大纲。由宣传处长李光恒宣读讲解。李是天津人，博学多识，很有口才，思想进步。他有一次和我们私下谈话，谈到思想问题时，他说，别人说我是共产党，其实我不是党员。不过共产党所

提出的口号，我全都赞成。冯玉祥领导下的干部，是没官架子的，县、厅长都和大家吃同样的饭。冯玉祥也以身作则，生活朴素，穿一身粗布灰军装、布鞋、布袜，与他的士兵同甘苦。

冯玉祥很注意培训干部，还吸收妇女参加各项工作。他在开封创办一所“训政学院”，专门训练县级各机关干部。公开招考学员，分行政、财务、公安等项。经过半年到一年的学习，分发各县工作，内中就招收一定数量的女学员。余心清担任院长。

冯玉祥担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后，除设宣传处外，又成立了“放足处”。他吸收一批女青年参加该处工作，宣传妇女放足和幼女不缠脚，以增强妇女的体质，革除千百年来对妇女的束缚旧习。幼女仍缠脚，家长是要受罚的。在他领导下的一些地位较高的干部，如有违者，就加重处罚。这是他对解放妇女的革新工作之一。

他常教育干部说，一饮一酌，当思来之不易。他经常领导受训的学员在开饭前齐念：“这些饮食是人民供给，我们如不给人民做好事，连猪狗都不如。”现在看起来，虽然有点形式主义，但说明他心中装着人民，也以此来教育干部。

冯玉祥破除迷信，不烧香敬神，把开封城内大部分寺庙拨给教育厅，安排作中、小学的校址。如文庙、宋公祠等闲散庙宇，都开办成学校。他提倡用阳历，阴历年、阴历除夕不准燃放爆竹，既节约了火药，又避免引起火灾。

他还反对干部特殊化。省政府的干部和勤杂人员的伙食是免费供应，伙食办得很好。有个干部误了开饭时间，非叫伙房给他炸樱桃丸子不可——其实有人误了开饭时间，伙房是会送来一份相当好的饭菜的。可这位干部异想天开，点名要做特殊的菜，被冯玉祥知道后，在大会上进行了批评。虽没有指名道姓，但也向大家敲了一次警钟。

冯玉祥的求知欲很强，经常向有专长的人求教。在开封时，他请来一位穿长袍的老头儿，住在他的办公大厅内。据说他请的是曾作过江苏省省长的王瑚，是教他占文的先生。后来，他到南京，曾请经济学专家马寅初做老师，教他经济学。有次，他在省府干部大会上，既通俗又形象地说：“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街上淘气，用浮土挖个坑，撒上一泡尿水，再用浮土盖上，行路人不留心，就踏上一脚尿泥。我冯玉祥现在还玩那玩艺吗？”以此来说明他的思想是随时代的前进而变化的，这也是针对有人说他是“投机”而说的。

冯玉祥在开封期间，叫他的卫兵拉着一辆人力车作模特儿，创作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一个苦力车夫，拉着一个头戴圆筒高帽的洋鬼子，手持文明棍，打着车夫快拉。并在画上题了一首诗：“一人坐车一人拉，同是人类有牛马；这种压迫真痛苦，唯望仁者来救他。”那时军阀混战，各有一个帝国主义作后台，来维护他们瓜分中国的利益。冯玉祥不买账，具有强烈的反帝思想。因此，他反蒋失败后，不住外国租界地，住在泰山，和当地农民同甘苦。

在北伐尚未结束时，他和奉系军队作战，俘虏了一批白俄雇佣兵，押到开封，在省府大门外示众，任群众来看看这些白俄的狼狈相，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威风。

12 一次，有个印度人来开封，这个人反对英帝国主义，有要求印度独立的进步思想，他曾对省府的全体干部和部分军队讲话，通过一位姓唐的政工人员作翻译，大意是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受英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和印度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冯玉祥所率军队的士兵，大部分是农民，大多为文盲。他很注意教士兵学文化，编了一些简易浅近的小册子让士兵们学习。

既识字，又从中学习一些浅显的知识。让士兵讲卫生，如在开封时，每隔一段时间，包几家澡堂，让士兵排队洗澡。要求士兵不要同用一个洗脸盆洗脸。两人一组，一人向桶内舀水，往另一人毛巾上倒水，避免传染沙眼病。

冯玉祥常以问答式的方法和士兵们对话。如：

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答：从农村来的。

问：你家里是干什么的？

答：家里是种地的。

问：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答：种地的。

问：你以后不当兵去干什么？

答：回家种地。

内中寓意，你本身就是农村的老百姓，就不应该压迫老百姓和骚扰老百姓了。他就是这样经常教育他的士兵不要忘本。

后来他隐居泰山，衣着和当地农民一样。他还请来一位画家赵望云，画若干幅农民生活的图画，他亲自题诗，刻在石头上。他是不忘农民大众的。

后来，我曾到太行山一带作旅行写生，路过河南省的百泉，发现在山坡下有一座“冯泉亭”。原来是纪念冯玉祥的。有一次冯玉祥到百泉疗养，住了一个时期。那时泉水清可见底，群众都来这里担水吃。距离稍远的群众担水不方便，冯玉祥便令人在百泉的西北角凿出几口泉水，便利了那一片的居民用水。群众感激他的恩德，就在泉的北面山坡下建造了一座亭子，树立一块石碑在亭中，碑阳刻上“冯泉亭”三个大字，碑阴是叙述其事。总之，冯玉祥在河南做了许多好事，群众是十分爱戴他的。

(安敦礼)

晓庄创办教育

冯玉祥与陶行知是同乡，陶的教育主张和教育理想，冯一直很为赞同。1927年3月，陶创办晓庄师范时，冯玉祥曾给予大力支持，慷慨捐赠3000元给晓庄办学。晓庄学校创办后，冯多次到晓庄参观访问。由于冯蒋一度不和，冯对晓庄的关心以及与陶的友谊，曾引起蒋介石的疑惧，晓庄师范最终被封闭，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在封闭晓庄师范的布告中所说之“勾引反动军阀”，以及通缉令中所说之“陶行知勾结叛逆”云云，皆指冯而言。

晓庄师范创办后，燕子矶、迈皋桥一带土匪猖獗，常出入农村，打家劫舍，搞得鸡犬不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1928年的一天，陶行知在燕子矶小学邀集一些乡村教师和地方开明士绅商讨兴办教育之事，忽然有人提出，镇上接到土匪恐吓信一封，要借3000元，随带香烟10条，花露水10瓶，三日之内务必送到，否则便如何如何。大家一听，都十分恐慌。陶先生鼓励大家不要怕，要联合起来对付土匪。

会后，陶行知进城与冯玉祥谈起此事，提到农民自卫缺乏武器的问题。冯当下表示，枪械子弹由他负责筹集。陶大为振奋，回晓庄后即串联组织“联村自卫团”，冯不仅送来了枪械弹药，而且派了教官来帮助进行军事训练。

忽一日，陶行知在校园内捡到一封土匪给他的恐吓信，要他交300元，一文不能少，如期不交，将杀得晓庄鸡犬不留。陶十分镇静，加紧了对联村自卫团的军事训练，并在晓庄一带设防加岗，昼夜巡逻。此外，陶还与冯玉祥商定，在土匪限定的日期里，由冯派兵来协助，其中有两个是神枪手。结果土匪不敢蠢

动，而且从此晓庄一带安定多了。

1929年初夏的一个上午，天气晴朗，冯玉祥来到晓庄师范参观。他穿着一身普通旧军装，头戴一顶草帽，步行而来，后面跟着两个护兵。乍一看，三个人竟分不出谁是士兵，谁是主帅。

晓庄农人听说有位“大人物”（当时冯是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长）要来，许多人都赶来看热闹。他们见到这位“大人物”这样俭朴，都非常惊讶。由于天气闷热，冯用草帽挥动不止，有位老太太出于崇敬爱护之心，把自己遮太阳的芭蕉扇送到冯面前，对他说：“用芭蕉扇吧！”只见冯很和善地接过扇子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其实有草帽，可以抵扇子用，这芭蕉扇还是你自己用吧！”这位老太太过后逢人便说“大人物”实在是个很有礼貌的好人！

一会儿，晓庄师范学校校长陶行知宣布开会，请大家坐好。陶请这位“大人物”上台坐，却不称他为将军或部长之类的台衔，只称冯玉祥先生，冯却谦虚地说：“这里很好！”就在台口一排凳子一角坐下。陶说了几句欢迎的话以后，请冯上台讲话。冯身材魁武、气宇轩昂，声音宏亮，的确有大人物的气概，他讲道：“这一向老百姓太苦了！别人打仗，害得老百姓逃难受苦，弄得大家有田不能种，生活困难，这都怪我们政府，不能把国家大事理好，让老百姓过舒服日子。听说此地还有土匪来扰害你们，写来恐吓信，除要钱而外，还要香烟、花露水。农村哪里来的花露水？真是欺人太甚！”又说：“对付土匪就是要胆大。只要胆大，就能把皇帝拉下马，而今不是没有皇帝了么？是被胆大的人拉下来的。有人问我，‘对付土匪，究竟用什么办法？’我告诉大家，办法很简单，只要大家能联合起来，准备和他们干。土匪虽然有枪，我们也有叉子扁担，保证他们不敢来。他们说是要杀得你们鸡犬不留，那都是吓人的话，不要怕！”

冯讲毕，宫前面的广场上视察了联村自卫团的阵容，他还表演了实地打枪的方法，讲解了利用地形与敌人作战的办法。

1928年，冯拿出2000元给陶，委托他在晓庄造几间房子。陶请建筑工程师朱葆初设计，房子式样和晓庄学校的校舍基本相同，都是草房大墙，共四五间，内有会议室、办公室、书房、卧室、厨房，离陶住的地方只有300公尺左右，这便是“冯村”。

有一段时间，冯偕夫人李德全每周六总要来冯村过周末。晚上他经常跟陶促膝长谈，对陶的事业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冯一到冯村，就换上粗布衣服，农人打扮，到农舍中去看看父老，问寒问暖，亲密无间。他说这是受陶的影响。

蒋介石听说冯玉祥与陶行知关系密切，而且晓庄有武装组织，十分疑惧。1929年8月的一天，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晓庄“参观”。蒋绕着晓庄学校察看后，在一座挂有“联村自卫团”招牌的土堡垒前，指挥随从进去查看，详细了解了里面的武器弹药。蒋介石知道这都是冯玉祥提供的，心里特别恼火。后来转到一座山坡下，听到有一处叫“冯村”，立即追问：“冯村是什么意思？”陪同者回答：“那草房是冯玉祥花钱建的，故叫冯村。”蒋介石“哼”了一声，便走了。这座“冯村”居然也成了晓庄师范的“罪证”，被查封了。

晓庄师范被封闭后，冯玉祥一直忿忿不平。他仍然关心着晓庄，经常到冯村去度周末。

1932年，余儿岗办起了儿童自动学校，当时陶行知在上海，写信来热情支持，并常带钱来。冯玉祥也经常到学校看望小朋友，鼓励他们办好学校，莫辜负陶先生的期望。

有一次，他在学校看见不少小学生头上生癞子，便问学生：“你们吃什么水？”孩子们答：“吃塘水。”塘水很不清洁，农家又缺乏消毒用具，这就难免会影响农人健康。他当场拉来学校校长

胡同炳，捐款 320 元，要胡同炳组织人打一口井。井很快打成了，有五丈深，解决了农民的吃水问题，冯先生并为井题了字：“请别临渴掘井。”至今井还在，农人亲切地称它为“冯井”，以纪念冯玉祥。

还有一次，冯玉祥到小学参观时，碰到一名校董——老农唐凤荣，冯有感于他对陶行知教育事业的热情支持，特别写了一副对联赠送给他，对联曰：“要收复咱们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当时正是 1933 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这副对联表达了将军的雄心壮志，给人们以极大的鼓舞。

（陈德全走访胡同炳、邵仲香及 93 岁的老农丁正富写成）

避居峪道河

1930 年春，冯阎反蒋战争在河南开始，秋末冯阎失败，冯退居山西绛州，后到汾阳洞庙内。蒋介石乘胜陈兵河南陕州灵宝一带，迫逼冯阎下野，阎锡山由太原飞往日本在中国的租借地——大连避难。当时有人劝冯找一安全地暂住，最好也到外国租界。冯说：“我是中国人，我不住外国租界，给我私人保险，这是耻辱。”劝者又说：“那就通电下野，以免蒋介石进攻山西。”“我不下野，你下野吧！”又被冯拒绝。劝者没趣而退。

冯感绛州距黄河太近，蒋介石的特务来往甚多。1931 年春，冯即率战后所余部队北来汾阳，冯本人住距汾阳县城约 30 余里的峪道河山沟中，山沟有小道一条，直通陕北，冯派其部下王国琛带两人查明小道交通情况，知可走单行人及骡驮子，但夹道树枝挂脸，难乘骑通过。冯随命李振宇手枪团驻峪道河周围，刘庄炮兵团驻峪道河，李中兴教导团驻汾阳城内，冯又在峪道河以 800 元购得小院一处，杨柳环堵，春夏之交随风飘舞，因此命名

为柳林社。

冯每日黎明即起，泉水漱洗，攀登山顶仰天高呼。声音洪亮，双目炯炯，宛如饿虎觅食，旋又俯首长呼，似有无限郁闷之气抒发未尽。

一日，冯夫人李德全劝冯说：“先生这样牢骚苦闷，于精神身体有损无益，你看过去大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卢子嘉等，轰轰烈烈，不几年寂焉无闻，与草木同腐；先生半生忙碌，无片刻闲遐，现在有了时间，可以读书写字，把愿意做的事愿意说的话写在纸上，可流传后世，比玩枪杆子好得多。”冯本好读书，听后颇受感动，即派人到陕北请来高清亚等，为其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同时又派人到北平请来几位大学教授，为其讲学。冯从此朝夕学习，不稍倦怠。

一日，冯说：“峪道河沟这么多树，都是别人所栽，我们乘凉，我们也应当种些树，让别人乘凉啊！”于是冯率领随从十数人，亲自动手，在山坡路旁栽添了杨柳。冯又说：“我爱吃水果，果树全是别人栽的；我们也当栽些果树，结了水果，让别人吃。”于是派人到烟台等地，买来苹果、桃、梨等树苗，率人亲自动手栽种。继又买地2亩，自己种菜；买羊30只、猪4头喂养。大有在峪道河安家落户的样子。

一日中午，冯坐在河边石头上看水。

冯问我：“你看水在干什么？”

我答：“水在哗啦哗啦地响呵！”

“你不用脑筋。”冯说：“水在喊冤枉呢！你听，冤枉，冤枉，我会发电，我会浇田，你不用我，我喊冤枉。”

我心想，“英雄无用武之地，水在替你喊冤枉吧。”似触目伤感，冯先生想不能在峪道河长住了。

避居在峪道河山沟里的冯先生是未忘情于军事政治活动的。1931年夏，冯派其外甥（忘其姓名）持冯密函前往甘肃兰州，策动刘郁芬的留守司令雷中田扣起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自任主席，出动所部（约一师之众）反蒋；派我到陕西汉中，策动张维玺的留守司令王致远进军甘肃天水，响应雷中田。在我和冯的外甥出发前，冯问我：“此次出发，越秦岭入汉中，步行千里，沿途情形艰难，事情又很重要，你对这事怎样想法？”我毫不迟疑地回答：“好比上一次前线。”这当然意味着必须胜利，冯的外甥也作同样的表示。但因王致远胆小未能及时行动，以致雷中田失败逃亡。与此同时，冯还策动石友三倒张（张学良）反蒋，由河北大名直取北平；策动吉鸿昌由河南信阳进军郑州；策动商震出兵山西，共同应援石军。但当石友三进到保定时，商震却出娘子关，截断石军后路，吉鸿昌军亦未开到郑州，石友三只好率残部投往山东韩复榘处，冯这一次反蒋军事活动又告失败。

1931年年终，我因离家多年，向冯先生请准20天假回故乡菏泽过年，当时冯先生送给40元的路费，我按期回峪道河销假。

一见面，冯先生问我：“二位老人家都好！”“都好，谢先生挂心。”我很感动地回答。冯要我坐下来，我一向对他有些拘束，不敢坐也不敢不坐地坐下来。

冯问：“多年没回家，这次亲朋都见面了吧！”“见过了。”我答。

冯又问：“他们对我的舆论如何？”

我说：“都说冯先生练兵好，不扰民，真爱民。”

“也有说不好的吗？”冯继问。

“没有。”我说。

冯有些慨叹地说：“我今住在山沟里，如瞎如聋，就你们十几个人跟着我，你们再不把真情实话告诉我，我就真瞎真聋了。”

我当时很受感动，忘掉顾忌，说：“老百姓都说好，政界、教育界也有说不好的。”

“说什么不好？”冯插一句问。

我说：“他们说冯玉祥太假。人生在世谁不爱吃爱穿，偏偏冯玉祥不然，不是吃不起，穿不起，硬要吃粗穿粗，装模作样，不近人情。”

冯说：“你怎样回答他们的？”

我说：“冯先生很自然，不是假。”

“不是这样回答法。”冯说：“我冯玉祥穿的三面新（里表棉）的棉裤棉袄，又结实，又暖和，中国人织的，中国人穿，中国四万万同胞中有多少人能跟上我穿这样三面新的棉裤棉袄？恐怕冬天穿不上棉裤棉袄的人，还不知有多少呢！我吃的白面馒头、大饼、包谷窝窝，白菜豆腐，喝的面条、小米稀饭，星期日还要吃大肉煮白菜，我这样的生活，中国四万万同胞有多少人能得到呢？我冯玉祥假到底，至死不变，是真是假呢！”

冯先生的这些话，历史已作了证明。

不久，冯派我到北京给王瑚先生送信，本来往返只需四天，我为贪看京剧，一星期才返回。冯见面即问：“信送到了吗？”“已送到。”我答：“王老先生问先生好，他本人身体也很好。”冯有点不高兴地问：“为啥一星期才回来？”我说：“菏泽老乡、亲友留我住两天谈谈，因此晚了一些。”“他们对我有什么舆论？”冯马上面转笑容了。我说：“他们多是学界及政界人士，都说冯先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吃苦耐劳，勤俭朴实。”

“不能都说好吧，也有说不好的吧？”冯有点怀疑地问。

“你就说我的短处吧，多说也不要紧，尽量地说，叫我痛快痛快。”冯接着说。

我虽自当学兵起就跟着冯先生，但直至做了官，对他始终有

些惧怕。这时只得说：“也有说不好的，他们说冯玉祥是倒戈将军，四次逼宫三次倒戈。我当时想这些都是事实，差开话题，没作回答。”冯说这不对，应当这样回答：“北京城里，这边是总统，那边是皇帝，三六九日朝贺，一撞钟，满城听见响。满街坐马车的大官，头戴顶子胸挂朝珠；一个国家，一位皇帝，一位总统，这是什么体制的国家？因此，我才逼宣统出宫。”

“黎元洪坐总统多年，只知纳福尊荣，对各省军阀年年混战、夜夜对敌，一句公道话不敢说，一点正义感没有；对于人民生死不顾，甘坐在北京当木偶，这不该逼他吗？”

“曹锟贿选总统，不问国是，每晚招妓到总统府，花天酒地。对于代表国家尊严的国旗，都没人负责管理。一日各国驻北京使馆电话问总统府，你们国家哪位死了，今日下半旗？总统府才知国旗掉下半杆来。这样的总统有失国体，是否应该逼他！”

“段祺瑞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丧权辱国，应否逼他！”

“张作霖兵所到之处杀鸡宰牛，十室九空，祸国殃民；吴佩孚惨杀武汉工人，反对革命；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排除异己，东北三省大好河山，拱手让与日军，吏污官贪，背叛革命，是否应当倒他们的戈！”

“今后如有这样的总统和军阀，我冯玉祥仍然逼宫倒戈，直至逼出一位真心救国救民的人来，我就不逼宫倒戈了。”

1932年下半年，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呼声压力下，借口休养，下野回奉化暂避。冯蛰居山沟，感到政治苦闷，军事苦闷，久静思动，乃到南京号召蒋与全国人民一致抗日，这出乎蒋集团意料之外。蒋介石在其同僚的“敦请”下，赶快回到南京。冯见蒋无诚意抗日，无法相处，便只身坐铁闷子车到泰安普照寺住下来。

（王赞亭，李少畲整理）

东游胶东

在中国地图上，山东像一只卧着饮水的骆驼，而胶东便是那伸向浩瀚的黄海和渤海之间的骆驼头。

胶东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它与朝鲜半岛犄角对峙，与辽东半岛遥遥相望，是据守渤海、黄海之要津。1934年5月，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按捺不住忧愤交加的心火，曾游历胶东，视察海防，接触民众，并激昂陈词，鼓动抗战，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轶事趣闻和诗词墨宝，至今仍在胶东大地广泛传颂。

“说一句痛心的话”

1934年5月15日黎明，冯玉祥由泰山五贤祠起程，乘火车而达潍县（今潍坊市）。途中，当随行记者问他此行目的时，他慢悠悠地说：“我这次到胶东去游览，并不是单去看看风景，可以借此去看看民间情形，并到海边换一换空气。再说一句痛心的话，以现在中国的情况，今年能到蓬莱阁、烟台去看看，不知明年又是何等情形。”

九一八事变后，冯以民族大义为重，力主抗日。1932年10月，他与共产党合作，开展抗日活动。1933年5月，他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一致武装抗日，收复失地，并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察哈尔抗战。但蒋介石置民族利益于不顾，明目张胆地勾结日本侵略者，向同盟军步步施加压力。冯恐引起内战，使日军坐收渔人之利，于8月4日愤然自卸同盟军总司令职，重返泰山。他每天惟以读书习字为事，似与世隔绝，实满腔愤慨和不平，仍时时

刻刻牵挂着抗日大计。当记者与他谈及形势时，他干脆地说：“中国今后命运的决定，只在几个字上，就是能抗战，就能存在，不抗战，就会被日本灭亡。”又说，“最怕的是我们办政治外交的人，与日本合在一起，那就非亡国不可……”

5月16日，冯在潍县参观了华丰染织公司。5月17日晨乘汽车开始了他的胶东之行。

像个老百姓

冯玉祥乘坐的是一辆破旧的蓝皮轿车。17日上午天阴将雨，冯带着几个随员及一小队卫兵来到了掖县。掖县县长刘国斌陪他视察了其特别关心的掖县中学。掖中的前身是省立九中，辛亥革命时期，教师赵金漳在这里发展同盟会，发动过莱州举义；九一八后，这里多次兴起学生爱国运动。冯不想在此久留，与校长高象久简单交谈后，由学生自习室南端夹道进入学校大操场，向整队欢迎他的学生们缓缓走去。冯身材魁梧健壮，山东农民打扮，头带白布包边的苇草六角大草帽，身着蓝土布衣裤，腰间扎着白土布带子，脚穿打了补丁的圆布鞋，边走边与左右陪同人交谈。他的卫兵和随从人员，也都穿得很朴素。那一天，一向衣冠楚楚的县长刘国斌也换上了补丁鞋（知冯要来，早有准备）。在大操场的西北端，冯给掖中的师生讲了话，内容是全国人民要团结抗战，不要打内战消耗国力。掖中是有光荣传统的学校，国难当头，同学们要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效力。讲完话后，在操场与师生合影。冯席地而坐，师生簇拥在他的左右前后。

冯给掖中学生的印象十分新奇。冯是西北军的首脑，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北伐，是著名的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不料却如此质朴和平易近人，像个山东的老百姓。这给掖中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

记忆。

合影后，冯即乘车向黄县驰奔而去。当途经招、黄界河时，他发现一座建筑宏伟的庙宇“镇河寺”和其对面高矗的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碑，便下车瞻仰，并以崇敬的心情仔细地拜读了碑文。于下午一时许到了黄县。

盘子虽少意义重大

冯下车后，与前来迎接的黄县县长范慕庐、教育局长徐叔明、他的旧属周绍南等一一握手，十分热情。

当冯与徐叔明握手时，范县长从中介绍说：“这是辛亥先烈徐镜心的后裔。”冯略加思考，立刻想起了镇河寺的烈士碑，又一次亲切地与其握手，并表示愿寻机深谈。

在与其旧属周绍南等人见面时，部属们叫以“总司令”称谓。冯风趣地说：“不要这样称呼了，人家都做大官去了，不跟我走了，我还当谁的总司令呢？你们叫我冯先生吧，叫老冯也中！”

冯下榻在丁家花园。这里楼台亭阁，怪石碧水，十分幽静。这天，范县长派人特备珍筵招待，忙得不可开交。冯知道后，极力谢绝：“我们历来不赴酒席的，老百姓的血汗不堪人口。你当父母官的，要尽东道主之谊，请改为大饼、白菜粉条炖肉。”范县长无奈，只得照办。便餐后，冯约徐叔明翌日8时来丁家花园畅谈。

次日，徐遵约拜晤。冯待人形同亲友。谈话间，他亲切地垂询徐的先叔徐镜心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帝制而被迫害以及家庭状况，勉励徐“继承烈士遗志，为革命奋斗到底”，并当场挥毫书一横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又送了一首写现成的诗给徐：

前方正抗战，蒋汪竟投降。
平素空谈话，离奇又狂妄。
岳飞是军阀，秦桧是忠良。
有人对我说，此话出于汪。
此为何哲学，有奶便是娘。

冯的这首诗，徐叔明视为珍宝，存于徐家旧居中，可惜十年动乱中失落了。

在黄县，冯应邀参加中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当徐叔明陪冯步入会场时，县立中学校长赵踵先前来迎接。徐介绍赵是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时，冯忙向赵伸出双手，以示钦佩。然后，冯对徐和赵说：“我讲话，不用你们事先介绍。”开幕式开始后，冯发表了朴实无华而激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就是那个倒戈的冯玉祥。为什么倒戈呢？因为军阀割据，称王称霸，百姓不得安宁，国家不得统一。听说你们开运动会，特借这个机会同大家见见面。”又说：“你们青年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国家兴亡完全仰赖在你们身上，所以求学时代，不但要读好书，还要把身体锻炼好。”说着，冯打开了由其随员抱来的一个大纸包，但见是一摞土瓷大盘子。冯大声说：“这是我对大会的献礼。这盘子价值虽少，但意义重大。优胜者可以获得此奖。希望你们将来把



冯玉祥将军向欢迎者讲话

国家治理得如磐石之安！”顿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冯走下讲台，来到足球场地，一脚将球踢开，激烈的足球赛开始了。

“只觉有张厚脸皮”

冯游胶东的消息，为其好友李烈钧获悉。李遂由上海赶来。5月19日，他们一行来到了蓬莱阁。

蓬莱阁坐落在蓬莱城以北临海陡起的丹崖山上。它始建于宋朝嘉佑年间，后经历代整修，形成一古建筑群，主要有吕祖殿、三清殿、蓬莱阁、天后宫、弥陀寺等六个建筑单体。每个建筑单体又由许多别具风格的楼、殿、亭、阁所簇拥。这里，楹联碑文琳琅满目，名人字画比比皆是，至于海市仙景，则更为过往游人看不尽、看不够。

冯玉祥和李烈钧来到蓬莱后，拒绝了地方的接待，下榻在蓬莱阁。李将军住在阁上，冯特意选了“避风亭”。阁上道士听说冯要住避风亭，忙为其洒扫，却被冯的卫队夺去了笤帚，说：“这不行，打扰百姓，当官的要骂我们的。”

在蓬莱，冯最关心的不是这仙那景，而是拜谒明代抗倭名将戚武毅（继光）祠。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今蓬莱县人。“封侯非我意，但感海波平”是他的两句明志诗。他毕生转战南北，戎马倥偬，为保国安民立下了丰功伟绩。冯游蓬莱阁，因心有所寄，“颇具时事感想”，故对戚继光的爱国精神更为钦佩。当天下午，冯步行蓬莱城，瞻仰戚继光祠堂。归来后，县长将一幅戚继光画像照片呈上，冯甚为高兴，遂为戚祠写了一副对联：

先哲捍宗邦，民族光荣垂万世

后生驱劲敌，愚忱惨淡继前贤

写毕，嘱县长代为刻制，悬于戚祠。对联取走后，冯兴犹未

尽，又慷慨执笔，写了《题戚武毅公》诗一首。在颂扬戚氏功德后，指出了“九一八，失三省，转年热河又退兵”的现实，抒发了“如今思武毅，只觉我们有张厚脸皮”的感慨！

在小住蓬莱阁的几天里，冯的爱国热情像火山样爆发出来。他会见一些军政人员和旧友，谈今道古，并登上天后宫的戏台，对青年学生发表演讲，疾呼“战则存，不战则亡”！有一天，冯在避风亭接见德国人、陆军大学教官兼炮兵总顾问司培曼，探讨抗日事。李烈钧也在场。谈话间，李十分激动地对冯说：“……一般人这样热烈地亲切地仰望着您，……无论如何，总须想个救国的办法才对呀！……”冯听了李这番充满爱国激情的话，“格格一笑”了之。李见冯似乎不为所动，便唤来笔墨，写下了敦促冯再度出山抗日的对联：

攻错若石，同具丹心扶社稷，
江山如画，全凭赤手挽乾坤。

李写就，即向冯示意补额。冯凝思片刻，拾起一支巨笔，蘸足阁上粉刷用的红土汁，挥笔写下四个雄健、质朴、刚劲的大字：

碧海丹心

拒收礼品

5月22日上午，冯一行到达烟台，住在原烟台海军学校。

烟台海军学校坐落在烟台东炮台东侧的山坡上。该校创立于1903年，毕业学生18届800余人，为当时北方著名的一所海军学校。1927年因故迁并入福州马尾海军学校。因数年没用，这里一片荒凉败落的景象。冯环顾四周，指着失修的校舍对随行人员说：“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大声疾呼‘海军救国’，一股海军狂风靡一时。可是到现在，中国的海军在哪里？连海军学校也成了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名词了。”他一边走，一边说：“一·二八战役的时候，中国的军舰一炮不放，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在吴淞口外横行，暗中却认贼作父。当国人群起而攻之时，竟厚颜无耻地宣布，是因船身腐朽，如开炮船身就要破裂云云。这就是中国所谓操练海军的结果。”

当天上午，冯到附近金沟寨村一个小茶馆里和几个农民、商贩亲切地交谈起来。近中午才若有所思地返回学校。他进校门时发现门口堆积着一些食品，马上感到事有来由，便到会客室查问。原来，当时请客、送礼已成全国普遍的风气，门口的那些食品，便是烟台商会送给冯的。冯查明了原由，郑重表示：“商会的盛意，十二万分的感谢；但送来的东西，实在不敢领收。”商会同仁看到冯态度坚决，言辞诚恳，万分钦佩，只得把礼品原封不动地抬了回去。

事后，冯对大家说：“目前中国社会处处充满了变相的馈送，直接间接养成贪污之风，造成全国上下贿赂公行，卖官鬻爵，贪赃枉法，行贿者狐假虎威，遭殃的是老百姓。至于地方人士供给过往军政官吏，更没有理由。第一，每一文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决不能随使用去；第二，军政官吏自有薪俸，地方上没有必要格外招待馈赠。”在场的人无不冯的一片冰心所感动。

次日上午，冯登上了烟台东山。他眺望大海，只见烟云缥缈，茫茫一片；他俯瞰港湾，但见美国军舰自由游弋，耀武扬威。他思绪万千，发出了“不平的世界不平的天”的呐喊。他抚摸着早已毁坏的古炮，痛心地久久不肯离去，夜晚也辗转难眠，思绪万千。他燃点暗淡的灯，写下了《游烟台》的白话诗：

……

东山炮台炮全毁，
西山炮位早坏了。

我所知道的冯玉祥

……

大好要塞不设备，
敌若来时只有跑。
试看政府枢要
还不是不抵抗当道?!

“吃饭穿衣量家当”

5月24日。威海卫。

冯玉祥和李烈钧在行政专员公署小憩。

行政专员公署在商埠区中央山坡上，其前身为英国驻威海长官旧址。走进行政公署，冯觉得这里过于富丽堂皇。地上铺的是那么厚的地毯，站在上头，软绵绵的滋味，叫你觉得比吃人参果还要好受；绿微微的沙发，浮着一层薄薄的绒儿，坐在上面好像喝了迷魂汤。他们在这里坐了半个钟头，便外出参观环翠楼。

路上，冯说：“吃饭穿衣量家当，官吏室中陈设，至少要与人民生产力相当……三百多方里的土地，数日之间被人家夺去，咱们眼巴巴看着没办法；老百姓生活不能维持生理上最低限度需要，咱们睁着眼看着同胞钻人鬼门关。而官吏之公衙，竟如此讲究，如此阔绰，这算什么官吏？这算什么政府？……”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千万不要忘记：主人吃的是草根树皮，穿的是千孔百结，住的是茅舍草窝啊！”

室内富丽辉煌，
官僚们视如平常。
民众住在土窑里，
还要增税纳粮。
官吏室内真堂皇，
老百姓不敢说一句心伤。

这便是冯先生当时写下的记实诗《阔官衙》。

在环翠楼，冯玉祥、李烈钧等瞻仰了清代爱国将领丁汝昌、邓世昌的遗像，回顾交谈了丁、邓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壮举，同时抨击了慈禧的骄奢淫逸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当时，正值英国海军在刘公岛打靶，隆隆的炮声，震得环翠楼沙沙作响，成群结队的飞机在天空中来往飞翔。帝国主义辱我中华的行为，猛烈地刺着每个人的心。冯很沉痛地说：“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更当如何？死的还得在这里出丑，九泉之下，想也不能瞑目！活着的除非是爱活着，不然，怎么还能两个肩托着头！……”言毕，拟就一联，挥毫而成，悬于丁、邓两先烈前：

劲节励冰霜，对万顷碧涛，凭此丹心垂世教；
悲山河破碎，望中原戎马，誓将热泪拜乡贤。

傍晚，冯一行返烟台。

“谁说国货没有洋货好！”

5月25日，冯玉祥在青年会的露天体育场向数千名群众发表讲话，并向青年会题赠“碎骨粉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一联，轰动了全城。

5月26日，冯又应邀在芝罘中学向全埠学生讲话。这天一大早，通往芝罘中学的路上呈现出一派热烈欢腾的景象。全市40余所中小学师生争先恐后、络绎不绝地前往。9点多，冯登上了主席台，全场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掌声。

冯说：“……去年的今天，是兄弟在察哈尔抗日的一天……结果看来，日本人不是那么可怕的。只要坚持抵抗下去，一定有希望的。”接着，他慷慨激昂地历述了抗日同盟军、特别是共产党员吉鸿昌所部在察北抗战中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战绩，同时抨击了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用讽刺的口吻说：“我的朋友蒋

委员长，自己不抵抗，甘心做卖国贼倒也罢了，竟然连别人抗日救国也不允许。”他勉励青年学生“学习戚继光，学习丁汝昌、邓世昌，将来担负起救国的责任。”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

在以后的几天里，冯参观了烟台的一些工厂，并宴请了各界代表。在参观烟台永康钟表公司时，他仔细地观看了工人的生产过程和各车间的产品，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感到无比自豪。他谢绝了厂方的馈赠，用倍价自购了座钟四架，并赞永康钟表曰：

……

不论钟，不论表，
大家都觉得外国物件好。
到烟台，看钟厂，
永康出品总得挽入超。
装置既辉煌，机件又灵巧，
谁说国货没有洋货好！

5月29日，冯结束历时半月的胶东之游，又回到了泰山。

爱国将领冯玉祥东游胶东距今已很遥远，但冯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清白廉洁、关心人民疾苦的美德却永远铭刻在胶东人民的心里。

(李丕茂)

视察临汝

1937年，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第六个年头。迫于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压力，蒋介石也煞有介事地颁布了《兵役法》，实行征兵，通令查编民间武装，修筑国防工事，似在加紧抗日准备。

那时，我在河南临汝县任县长。7月的一天，郑县县长给我来电话说：“冯玉祥副委员长明日一早从郑县出发，去你县视察国防工事。”我立即通知本县各机关职员、保安队官兵和抗日工作训练团全体学员，务于明日上午8时以前到县城东关迎候。

第二天上午8时半，一辆小汽车和一辆卡车在临汝东关停下。冯玉祥下车后与我握手。我自报姓名、职务，他也向我介绍了随行的军政部两位职员和他的秘书、《中央日报》记者各一人。遂即沿着欢迎队伍巡视一周，并多次举手向群众致意。

巡视毕，我请他上车到县政府休息。他说：“我们边走边谈也好。”在步行中，我告诉他：“利用暑假，我把全县的中学、师范学生集中起来办了抗日工作训练团，内分为宣传、军事、侦察、医护四个班，采用边上课边实习的办法。今天冯副委员长来视察，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请副委员长给他们讲讲话吧。”

他说：“很好。我们不必再去县政府休息了，现在就去讲话吧。”我立即派人跑步通知抗日工作训练团。等我们到达时，全体学生已集齐。

我先介绍了几句，就请冯玉祥走上讲台。他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妄图并吞中国，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国四万万同胞，只要人人奋起，个个向前，就一定能够把日本鬼子赶出国境。你们这些优秀青年，正在茁壮成长，是国家的坚强后备力量，你们必须学会一套克敌致胜的本领，随时准备报效国家。”接着，他又介绍了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情况，分析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好形势，学生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冯玉祥一共讲了45分钟，我让人作了详细记录，印发全县工作人员学习。

冯玉祥讲话后，稍事休息，就与随从人员到各处视察国防工

事。我向他汇报道，临汝县的国防工事是根据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颁发的设计图纸，在县城周围和公路两边修建的。每区各调500民工，共计4000人，划分地段同时施工。每人每天发五斤备荒积谷，十天发放一次。冯玉祥听后高兴地说：“你这样做，我很赞赏。每个民工每天发给五斤积谷作为工资，既不增加民众负担，又能激起民众干劲。这种办法很好，可以推广。”另外，我还告诉他：“为了避免多占耕地，这些国防工事表面看来排列不够整齐，但实用效力不会降低。”他点头同意。

后来，冯玉祥又问到地方民间武器的调查登记和编制问题。我说：这事开始时困难颇多，主要是老百姓顾虑重重，一怕报出武器为政府没收；二怕报出武器充实国库；三怕报出武器编为抗日部队调离家乡。为了解除民众顾虑，我县聘请素孚众望的上绅为查编委员，由他们带头报出所有私存武器，又拟定了查编条例广为宣传，提出了“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口号。老百姓看到士绅做了表率，终于解除了顾虑，查编工作顺利完毕。全县按地区分为11个支队，合计长枪11000多支，手枪500多支。支队下设中队、分队，选择民众信得过的人担任队长。

冯玉祥视察结束后，当天下午5点乘车去洛阳。临行时，我和县政府各机关首长为他送行。他握住我的手说：“我这次在湖北、河南视察了好多地方，各方面工作使我都比较满意的就临汝。你们的最大优点是能够时刻把国家和民众放在心上。你能干、肯干，会动脑子，遇事能想出办法。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打败日本鬼子多做贡献。”说罢同送行者一一握手告别。

冯玉祥视察临汝不过一天时间，给临汝各级干部留下深刻印象。国民党统治时期，每一个中央委员外出视察或旅游，总是在很早以前就通知当地做好迎接的准备。比如：蒋介石游嵩山，一个月前就通知我这个当时的登封县长，到洛阳与专员、司令们商

谈迎接事宜，为了使蒋介石的汽车能够开过山去，调集 5000 民工，夜以继日，费时一个多月，耗资数万元，才修通了轩辕关的“十八盘”公路。蒋介石到的那天，除沿途有一个师的兵力布防外，随身还带着一个宪兵团。单是各种食品和装备，就装满了 11 辆大卡车。冯玉祥当时是国民政府中仅次于蒋介石的人物，可是，他来视察，我事先完全不知道，只是来的前一天才接到通知，县里没做任何准备。冯玉祥来时，只带大小汽车各一辆，随行四人。卡车上装的是日常必需的行装和衣被。视察国防工事，完全步行。中午在县政府用餐，只让准备了五六样荤素菜。这在当时，比接待一个普通职员差不多。这在中国历史上实不多见。

(毛汝军，贾广兴整理)

贵阳买灯盏

1938 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日军占领武汉，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冯玉祥将军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于 1938 年 12 月有一天由重庆去贵州视察，他的卫队营葛营长带领一个连护送。冯偕夫人李德全坐黑色大比尔克轿车，卫队连乘三辆军用卡车，中午到达贵阳，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等文武官员出城迎接，至贵州省政府休息并进午餐。

我当时任国民党军驻贵阳市宪兵营七连排长。宪兵营长戴尧天命令我率领一个排前往贵阳电厂冯副委员长下榻处担任警卫。这个供贵阳照明的电厂因机器陈旧，日军疯狂轰炸，电机没有零件修理而停止发电。坐落在贵阳南明区的电厂办公楼，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空气新鲜，是当地条件较好而安全的地方。我带宪兵到电厂后，院内已打扫得干干净净；护送冯将军的卫队连和所乘三部卡车，已停在电厂对面南明桥院内。全连官兵正在吃午

饭。我找到葛营长，一同去电厂院内察看并巡视了周围，商量设置警卫岗哨的位置，接着召集全排宪兵讲明任务，布置站岗地点、值班人员及应注意事项，安置好宪兵住室。我同葛营长和冯将军的王副官将冯将军夫妇的被褥衣箱从卡车上搬到楼下一间卧室内，王副官把被褥打开，铺在床上。被褥全是白粗布里，蓝印花粗布面，白布床单，身为副委员长的冯将军，盖的铺的是粗布被褥，使我感到过去传说冯将军过的和战士同样艰苦朴素的生活实是名不虚传，我内心敬佩万分。

下午6时许，负责照料的勤务员把煤油汽灯点燃，又预备了数盏煤油罩灯，这时冯将军偕夫人由吴鼎昌陪同回来，进入客厅相谈约20分钟，吴乘车离去。这天，冯将军虽乘车长途跋涉，但不顾疲劳，在灯下看文件到晚11时才休息。次日早晨6时许，冯将军同夫人去对面南明桥散步，并看了卫队连的住处，返回进早餐。桌上放了四样小菜，吃的是稀饭馍馍，很是简单。冯将军在贵阳住了7天，除外出路远开会、视察乘汽车外，有时身穿中山便服徒步到贵阳市内看看，因我负责安全，冯将军步行外出时，我即派6名武装宪兵跟随保护。冯将军看有武装宪兵前后护卫，就把我叫去问是谁派的。我答：“报告副委员长，是我派的武装宪兵，保护你的。”他当即用命令的语气吩咐：“以后不要派武装人员随护。”自此以后，每逢冯将军偕夫人徒步外出，我就和四名宪兵换上便服，跟随警卫。

一天下午，冯将军身着草黄呢子中山服同夫人步行到贵阳大十字街口，已是下午5点半，这是贵阳最热闹的道路，行人很多，有些人停步观看身躯高大、形象亦庄亦谐的冯将军，有人小声说：“这人一定是个大官。”冯将军同夫人进入一家土产杂货店，看见柜台内摆有陶土烧的黑色磁灯盏，是点植物油的，问了价钱，店主说：“这是乡下人点的灯盏，每个卖六分洋，你大人

不要这个。”冯将军说：“我买30个。”店主人慌忙挑选了30个，用细麻绳从灯盏碗心中串灯芯的小窟窿里串了两串，每串15个。葛营长和我每人提了一串，随即秘书付了钱。又逛了几家大商店，街上已是灯火明亮，来往行人很多，贵阳的夜市开始了。贵阳在旧社会与其他省的城市有个不同的习惯，就是中午12点以前街上人很少，生意店铺多不开门营业，而到了夜晚，商店灯火通明，街上人群拥挤，买卖兴隆。这时，冯将军问我：“贵阳为什么是夜市？”我即回答：“贵州人吸鸦片的多，因染有烟瘾而懒，人多上午睡觉，晚上有精神在市上买卖。”冯将军说：“现在还有种卖鸦片的吗？”我回答说：“贵阳市内开大烟馆的已没有了，还有偷卖大烟的黑市，县城有的仍半公开买卖大烟（鸦片）。”我随冯将军往回走，进了电厂门后，冯将军说：“禁烟禁毒不彻底，要宣传执行禁烟禁毒条例。”

我用请教的语气说：“副委员长买这么多灯盏何用？”冯将军说：“卫队营每连发10个，叫弟兄们晚上学文化用。”接着又说：“煤油很缺嘛！菜油茶油到处有，又省又方便。”当天晚上我去卫队连，就看见每10来个士兵围着一盏灯，有手捧识字本的，有看操典的，都在学习。

冯将军和夫人天黑时才回去吃晚饭，桌上摆着两荤两素，米饭、馒头、红豆稀饭，因为冯将军爱吃五香大头菜，每天必有大头菜烧肉，生活非常简朴。

(何宝善)

重庆砥时弊

1940年，冯玉祥将军在重庆住巴县中学，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与何应钦是死对头。何系军政部部长兼军事委员会

参谋长，日本留学生，有崇日怕日亲日的思想，对抗日持消极观望的态度。冯则主张积极、坚决抗日；何在纪念周会上公开讲，日本每月能制造多少架飞机，多少尊大炮、坦克车及各种炮弹等数目，我们既不能造飞机，又不能造大炮，与日本对比相差太远。冯说，日军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要灭我们的种族，岂能袖手旁观坐以待毙，甘心作亡国奴？只要我们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一致抗日，精神胜于物质，人力胜于枪炮，来一个日本人，我们用四个人对付他，前后左右一齐下手，日本人有一支自动步枪，我们用四支五响步枪对付他，谁胜谁败，谁敢确定。如若等到我们会造飞机大炮时再抗日，那就晚了。二人争论不休，冯对何寸步不让，非常不客气。

冯每日在军事委员会办公，事事认真，引起蒋的亲信全体攻击，他们想办法先拥护蒋后排挤冯，理由是：“现在抗日期间，军事统一，党政统一，需要一人领导，不能有二人领导。”拥蒋为总裁。军事委员会只设一个委员长，取消副委员长，改委冯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及训练总监，令冯担任训练全国军队的职务。冯就职后到贵州、湖南等地检查督促队伍，不料遭到蒋部的一齐反对，不与冯见面，训练任务执行不下去。冯回到重庆对蒋述说实情，因而取消了冯的训练总监职务，冯只余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及中央委员两个职务了。他每星期到军事委员会一次，事情也就少了。但是每月还领500元的薪水，蒋介石每月还津贴3000元的补助费，因冯带着秘书、随从30多人，来往客人很多，每月开支仍是不够，冯还带一个手枪团500多人，团长葛效先，每月薪饷由军政部发给。

郭沫若先生也住巴县中学内，来拜访冯，出示名片，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就赶快送上去，冯一看名片就穿上制服，很客气地接见他，谈得津津有味。临走下楼送到

门外。

有一次，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拜访冯，冯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住的那院里有孔祥熙的私人仓库，藏满了汽车轮胎及交通器材，为什么不叫他拿出来支援抗战呢？从云南运来一批大烟土，还往外运出大批黄金，为什么你不弹劾他？于答，蒋介石都知道，我们弹劾他也无用。冯一笑了之。

有一次孙科来拜访，冯对孙很诙谐地说，请在我这里吃便饭换换口味吧？冯本来每星期吃一次棒子面窝窝头，掺一点白面作出来劲硬硬的，甜丝丝的，很好吃，今天冯故意请孙吃这窝窝头，看孙的样子很难下咽。

有时何应钦和陈诚也来拜访，冯对他们非常严肃，谈话很少。还有少数蒋的亲信将领拜访冯，说是来请教，实际是想看冯是个什么样的人。冯叫拿出中国制的纸烟和普通的茶叶招待他们。对何、陈等人，冯都是在楼下会客室接见、谈话。

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周恩来来拜访，冯总是在楼上自己办公室里会谈，临走时总是下楼送出门外。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来拜访冯，总是以长官部下的态度对冯。

军训部部长白崇禧拜访冯，总是以捧场的态度对冯。如冯与何应钦辩论后，白一定来访，说冯讲得太对了，大家都有这样的感想，但都不肯说出来，你老真正为国为民，直言不讳，大快人心。这些话说得冯哈哈大笑。

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拜访时，对冯实话直说。都是安徽巢县的老乡，张以前辈看待冯，感情很融洽。张治中火烧长沙，人人不原谅，冯说：张治中火烧长沙是奉命令的。除冯以外，别人没有说这话的。

七八月间，何应钦在军政部纪念周会上讲话，说中国抗战越抗越强。在抗战初期，军队只有100万，汽车800辆。现在有

300万军队，3000辆汽车。有山西阎锡山的十几个师，四川的十几个师，广西的十几个师，云南龙云的几个师，还有张学良的部队等等，都表示听从中央指挥调动。现在西南公路上宋子文增添了1000多辆汽车，西北公路孔祥熙增添了1000多辆汽车。虽然是孔、宋增添的，但都能听从中央调配等等。9月间，何又在军事委员会上作同样的报告。冯就质问何：“我看是越抗越弱。从东北三省逐步退却，还准备退守西康，幸而四川有山水之险，巫山三峡之阻。若是平川大道，日本早到了重庆，我们能算越抗越强吗？对于汽车运输来讲，我们从美国运来的飞机大炮枪弹，在越南缅甸某处仓库里存着，按数量算起来够抗日三年用的，临退却时，没有运出一点来，都叫日本人得去，这3000多辆汽车到哪里去了？这算越抗越强吗？”问得何应钦目瞪口呆，无以回答。

孔祥熙是冯在南苑练兵时的很早的相识。在重庆时，孔除年节时拜访冯外，平常日子不多语谈，见面时孔常尊敬待之，实则敬而远之。

1942年召开中央委员会议时，阎锡山不到重庆，委托冯玉祥全权代表。冯派人到广西桂林请老友李烈钧务必出席这次会议。李带病到重庆，住在冯的办公室里，每日由冯供应一切。冯对李说，这次大会，有许多问题需待解决，到现在蒋委员长对抗日还不认真，就以在重庆的军官家属来说吧，军长、师长、旅长、团长的儿子兄弟亲戚朋友不出来当兵抗日；就拿普通官员来说，专员、县长、科长、绅士、财主的儿子兄弟亲朋也不出来当兵抗日；真正抗日的是谁呢？都是穷小子及后方的八路军，在前方抗日的，称为杂牌军队，如东北军、西北军、广西军、云南军、四川军等等。没有娘的孩子，谁打光杆了，就让谁闲着。蒋“亲生的儿子”都在后方训练、补充、休养。胡宗南在陕西有20几个师，还没出潼关向日本放一枪一弹呢，怎能打出去

呢？既然能把日本打出去，恐怕以后还有乱子闹哩。李烈钧躺在床上光哼，不加讨论。李还带着护士、儿子、女儿等待候他。跟随冯的左右都说，请来吃客，帮不了腔。

开会的头一天，冯当场揭发中央候补委员肖振瀛，冯说，蒋委员长左拿汉奸，右拿汉奸，现在汉奸就在你面前，为何不拿呢？蒋说哪一个？冯说肖振瀛勾结日本压迫宋哲元；叫宋当汉奸，宋不干，肖就在宋内部挑拨离间，叫冯治安、张自忠反对宋哲元，肖自知不能再在宋部当官，就拿宋哲元的势力威胁中央，并给他个人要官做，当了中央候补委员，这就是两面的汉奸！为何不拿呢？肖在后头坐不住了，站起来灰溜溜地走出去，到孔祥熙公馆里住了20多天没有出门，后经孔祥熙、何应钦讲情也就没事了。

隔了两天，吴稚晖在大会上攻击冯玉祥是共产党的外围，是共产党的代言人，说于右任、孙科是左派。于、孙不答。冯大怒说，国难当头，关系民族生死存亡，八路军在敌人后方抗战，既无枪炮弹药的补充，又无飞机坦克协助，常年困苦抗战拉住敌人的后腿，事实俱在，我们中央部队，哪一个能撑得住呢？我们说几句公道话，就算是共产党的外围，替共产党说话吗？现在大敌当前，应当秉公说话，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该处罚的处罚，该奖励的奖励。冯回来时我见他的嘴唇都气紫了。

第二天下午于右任来晤，劝冯不必生气，并说吴向来说话随便，自以为清高。冯就说于，你这么长的胡须不管事了，监察院不弹劾别人，别人就要弹劾到你头上来了。

第三天孙科来会冯说，吴老头终日无事，想起谁来就训谁，给他缠起来没有头，口里说，笔下变，谁去缠他？所以我也不理他。冯说他是随从总理的老革命，怎不给蒋委员长缠缠呢？拿抗日的现实给蒋缠缠，才算是革命的老英雄。孙说，他要有这样的

思想，就不是现在的吴稚晖了。

1943年，鹿钟麟当河北省主席，回重庆时，冯问鹿为什么回来啦？鹿答日本的扫荡，八路军的摩擦。冯说八路军能在敌后常年抗战，你为什么不投八路军一同抗战呢？鹿说，我没有这样的胆量。

鹿钟麟回重庆后有几亿款子报销不了，因何应钦说没有单据无法报销，鹿作了难，又找到冯玉祥。冯亲自找蒋介石说，鹿钟麟在河北省被日本人赶得把鞋都跑掉了，哪里还顾得拿着单据跑呢？鹿也是个穷小子，怎能赔得起这许多款。蒋于是写了条子准予报销。

鹿到重庆后，何应钦一再托鹿向冯解释，以求得互相谅解。鹿对冯说明此意，冯说我对何没有私人意见，但是遇见国家大事，何说的对，我当然承认对；何说的不对，我能说他对吗？我冯玉祥不是那样的人。请鹿转达给何。

此后军事委员会要开重要会议时，何很为难，若不通知冯，怕他责问；通知他参加呢，又怕冯当场揭发找岔子，令人难堪，因此在开会以前，预先主使某大学校长邀请冯去讲话，约定了日期时间，冯答应了，何这才下通知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冯接到通知一看与赴大学讲话的时间相同，但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就答应了去大学的讲话不能失约，只有不参加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到大学去了。这样，正合何的意图，以免会上争论。

这年9月，冯的生日到了，冯怕人知道，早晨就坐汽车去乡间避寿。上午在一个小学校里休息，到晚上才回重庆特园二号。是日中午，各部部长及院长们都来给他祝寿，蒋介石也来了，冯不在家，鹿钟麟出面招待，还备了两桌酒席待客。冯回来后看到桌上放些红缎子皮的大本子及祝寿的诗词，鹿接着汇报当天的经过。冯听了大火，就说，这是我家里的事，为什么要你操心、给

我装脸面呢？我冯玉祥一辈子没过生日也活这么大，你今天这样干还想叫我保你再当省主席吗？把鹿训得面红耳赤。第三天，鹿仍然到冯那里去，并不介意。

年底，何应钦在军事委员会上汇报说，后方重于前方，后方有计划有准备，使前方得到了适当的补充，才能打胜仗。今年由师管区、团管区、补训处征集了100万壮丁，补充前方部队，增加了抗战力量。冯说前方重于后方，如前方节节退却，由东北三省退到四川，失去人力、物力的条件，丢掉粮弹的仓库，使后方手忙脚乱，打乱了计划，失去了补给；后方应以前方为重，前方需要什么，给他什么，前方可以充足，后方可以接济，就如前方士兵，泥里去水里来发一身单军衣，如罗底之薄的稀布，一经摩擦就破，露着大腿出来，后方各部队军官们，穿着哗叽的军装，漂白的手套，高腰马靴，金戒指，金丝眼镜，金表链子，头上擦的油可滑倒蝇子；脸上擦着雪花膏，身上洒着香水。前方士兵有啥吃啥，有高粱吃高粱，有棒子吃棒子；后方吃啥有啥，想吃山珍海味有猴头燕窝，想吃鸡鸭鱼肉，有煎炒烹炸；前方流血流汗，后方吃得顺嘴流油；前方努力抗战，后方努力打牌；前方艰苦奋斗，后方花天酒地；前方如地狱，后方赛天堂，前方的官兵人人都愿意到后方来，后方官兵人人都不愿意到前方去，怎么能打胜仗呢？是否应该颠倒过来。对于今年征集壮丁来说，其数不小，费力也不少，但起的作用很坏，由乡间征来的壮丁，又红又胖；来了不过三月，又黑又瘦，一变而为瘦丁，由瘦丁变为病丁，由病丁变为死丁。老百姓把孩子送到军队里如同送到阎王殿去一样，人人寒心，现在重庆市的新兵就有这种现象。何应钦当时不能辩驳，蒋介石面带着不高兴，冯也很不高兴地回来了。蒋回家后气汹汹地对他的儿子蒋经国说，冯说话太刺激人了。蒋经国说，冯既然说重庆市里有这样的现象，可以去看看。蒋介石本

来不大爱出门到下层去，因与冯斗气，第二天果然出去察看。陕西街有一团新兵，蒋到院子里一看，房檐下、石台上，躺着十几个病兵，面朝里，腩朝外，脱下半截裤子来，顺着腩沟拉稀屎。蒋进房里头，看楼下无人住，楼上有人住，但没有梯子可上，就叫人安上梯子，上去一看，百十个新兵都躺在稻草上，面黄肌瘦，一个大马桶放在房角，拉屎拉尿都在这里。蒋下楼又到对门那一连去看，房檐下、墙角里躺着十几个病兵，有的哼哼，有的快死了，不会动了。蒋进房一看也是楼下无人，楼上有人，没有楼梯，安梯上去，看到100多名新兵面如黄土，骨瘦如柴，也是一个大马桶放在房角，不准下楼，恐怕他们逃跑。没等去看第三连蒋就发火了，马上令兵役署署长程泽润前来。程接到电话，即刻坐汽车到陕西街见蒋。程穿着黄呢军服，衣帽整齐，又白又胖，40多岁。蒋开口就骂他把兵役搞得这么糟！将文明杖照程打下去，当时文明杖就折为两段。程说，我是陆军中将，委员长不能打，若是我有罪，你枪毙我吧。蒋大怒说，拉出去枪毙。这时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坐着汽车赶来求情，把程暂时押起来了。

过了一个星期，蒋冯见面的时候，蒋表示兵役办得很坏，并说，焕章大哥，你练兵有经验，请你搞搞吧！冯答我搞不了。蒋又说，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冯说，我介绍三个人吧，第一个鹿钟麟，第二个于学忠，第三个石敬亭，随你选哪一个。蒋就决定了鹿钟麟。冯说鹿在何应钦的指挥下，恐怕搞不通吧。蒋说可直属军事委员会设立兵役部。

有一次蒋对冯说，大哥，请你到我那里住几天，仔细商讨抗日计划如何进行。二人商议按一个星期的时间详谈。冯问几时去，蒋答回去准备好了房子，明后天吧。冯说听你的电话吧。冯把应带的行李准备好，在家候着，不出远门。等了一个多星期，未来电话，冯着急了，自己打电话直接问蒋，蒋说还没接到电话

吗？请你这就来吧。冯带着行李到蒋那里，住了三天就要走。蒋再三挽留，希望多住几天，还不到一星期呢！冯见蒋听不进去，多说无用，便爽直地说，你这里是光明世界，外面一片黑暗，如再多说些，得罪别人，就怕我回不去了，留些话以后再谈吧。

1944年，冯在四川各县为抗日募捐，很受群众欢迎，有大批捐款，也有小批捐款，有的当场脱下皮袄大衣捐上，也有摘下金戒指捐上的。最后到成都也颇受群众欢迎，甚至连成都飞机场的美国人 also 来参观。

冯拟由成都到西安，由西安到兰州，由兰州到宁夏马鸿逵那里，脱离四川重庆就自由了。马鸿逵也是冯的旧部，冯预先派人告知他要到那里去住。马极表欢迎，并说韩复榘能保护冯先生，不怕落嫌疑，我马鸿逵就不能保护冯先生吗？但是冯到成都后，蒋介石早有准备，怕冯再跑了。因为1929年冯在南京当军政部长时，第一次不辞而别，跑回河南，在1930年闹了个蒋冯阎中原大战。1931年，冯第二次从南京不辞而别，跑到山东泰安普照寺，至1932年到察哈尔张家口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口号是外抗强敌、内除军阀，一再通电骂蒋不抗日，还不准别人抗日，叫蒋很伤脑筋。

这一次，冯又想不辞而别跑到宁夏，蒋介石不仅在成都早有安排，不允许冯再往北走，并且用电话请冯快来重庆有要事相商。冯说我是有名无实的职务，如有喜忧大事，当之候相而已，有何大事相商？但也只得失望地回重庆了。

附记：

我叫王丕襄，字赞亭，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任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兼旅长时，联名通电骂蒋介石不抗日，并不许别人抗日，蒋派特务想杀害我，故更名王赞亭。

我是冯玉祥当十六混成旅旅长时模范连的学兵，毕业后升副目、正目、司务长、排长、连长、营副、营长、团副、团长、旅长、副师长及两次随从，共20余年。冯在南苑时，我当过一次随从。蒋冯闹中原大战，冯失败后，我在山西汾阳县峪道河柳林社及山东泰安普照寺、张家口土儿沟，作冯的随从，又在四川重庆作一段随从。因我军衔低，知道的不全面、又不具体，并且冯在重庆来往的人非常复杂，经过时间也久，使人难以记忆。以上所述，不仅有遗漏之处，即对于时间，也难免有差错，敬请各位指正。

(王赞亭)

威远献金

1944年元月，我从威远县政府军事科办完“裁科并团”的结束移交工作^①，走上新的岗位不久^②，冯玉祥将军为了抗日救亡，在全国发起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经富顺自贡来到威远，下榻在威远煤矿驻城办事处，住了四天。冯来威远，计划在县里发动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之前，召开一个慰劳抚属大会和主祭阵亡将士大会，并在县建立忠烈祠，把阵亡将士的“神主牌”送入忠烈祠供奉，以表彰忠烈，鼓舞抗日士气。由于我曾在威远县政府军事科分管抗战兵员征补和将士阵亡优抚工作，县长黄达夫就派我查

45

① 1943年6月，奉国民党中央政府命令：各省、市、县政府军事科裁并当地“国民兵团”，以便统一兵员征补训练工作。但以后在抗战胜利国共分裂打内战时期，各市、县政府的军事科又恢复设立。

② 军事科裁并后，前任县长周子强即调我到县警察局任行政科长，抗战胜利后我请长假离职。

清档案，协同“县优待委员会”工作，并把本县前后出征新兵和阵亡将上人数告诉他^①，同时，指派我在两个大会上“司仪”。因此，我有幸和冯接近。

冯将军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身着简朴的布大衣，每日早晚常到西门城墙边眺望远山（大小老君）近水（清溪河），也对我们作些必要的询问。当时，我听说冯出身贫寒，年仅12岁就投身军旅，曾亲自策划滦州起义，响应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又在北京驱逐逊帝溥仪出故宫；五原誓师，他把自己的部队改为国民军，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家大计等等事迹，内心本已对冯非常钦佩，及至得以听其言，观其行，就使我更对他肃然起敬。

在献金大会召开前，威远县商会会长颜怀西说：“冯玉祥装模做样，无论他说什么，我是不献金的。”会进行中，冯将军声似洪钟，满怀深厚的爱国热情，斩钉截铁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敌入侵，我前方将士浴血抗战，我们后方的老百姓岂能无动于衷，不献金救国吗？如果有人丧心病狂，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他就不是炎黄子孙，就不是有出息的中国老百姓。”颜怀西在亲耳听到冯将军两个钟头以上、感人肺腑的讲话后，感动地站起来说：“我代表全县商户拥护献金，争取多献金。”结果，我县献金2000多万元法币、布军鞋10000双。可见冯将军的至诚能够教育顽固分子，更能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内忱。

我县忠烈祠选建在武庙后殿，曾请冯将军在黄纸上写下“忠烈祠”三个大字，然后贴在殿前横匾上。油漆“神立牌位”写上阵亡将士姓名，大会后由群众整队将牌位送到后殿，安放于壁前

^① 威远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征兵，从成立兵役股起至裁并军事科止，前后共出征壮丁9800多人，正式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发的阵亡将士抚恤令的有200多人。

周围的特砌砖台上。

大会在县城西门外大操场举行，到会一万多人，将所有阵亡将士神主牌先放置在三个柏树枝扎的亭子里，军乐队、民乐队、学生队、县级各机关团体都参加了奉送牌位典礼。队伍经过大街时，家家户户燃香点烛，摆设香案，鸣放鞭炮。牌位进入忠烈祠后，冯又在祭台前主祭如仪。

在大会上，阵亡空军将士袁芳炳的五弟袁芳勋致词说：“我的哥哥在抗战中阵亡了，父亲听说将军亲自来主祭，并送阵亡将士进入忠烈祠，因有病不能来，特叫我来代表并致谢意。我们袁家有两千多户人，全族人都感到无限光荣，我们这一乡、这一县都感到特别光荣。”

散会后，“县优待委员会”主任委员黄达夫县长，秘书钟韶春还遵照冯将军之嘱，分头率领工作人员和学生队给每一位阵亡烈士家属送去米、肉、棉花、蔬菜和一些用品。

这次亲见冯将军仪容、作风并亲聆讲话，我深深认识到冯是一个走过曲折道路、忠于人民的坚定爱国者。

冯将军在威远的爱国事迹，是他的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值得称颂的一页，特录之以志不忘。

（王崇哲）

47

江津募捐抗日

1944年春，冯玉祥由重庆乘专轮到江津县，发动各界节约献金救国。随行人员中有李德全夫人及冯纪法、谷自成（谷良民的儿子，光华大学毕业，随冯工作）等。因当时我在贵州毕节川滇公路局工作，离江津两三日可到。待我乘车到泸州换船赶到江津时，献金活动已届尾声，正赶上在酒精厂给冯送行吃晚饭时得

见一面。他乡遇故倍感亲切。冯还是穿着他冬天的半截子蓝布大棉袄，腰中扎着一条布腰带，吃饭时脱了棉袄穿着毛衣。饭后只问了我一些生活工作情况。因室内都是西北军老部下，他接着说我现在不自由啊！您看我虽专轮出发，船上穿军服的是卫队，穿便服的是特务，名义上是保护我的，其实都是监视我的；前些日子我到成都献金没住几天，蒋打电话给张群叫我快回去，这几天来江津群众捐献情况很热烈，可是特务又在暗中搞破坏，如县高中女学生倡议每人每月捐布鞋一双，全县女生响应，不几天捐献了几千双鞋。特务们说上兵穿惯草鞋，布鞋没人穿，只有老冯从前带的北方兵才穿，这不是造谣破坏吗？又如一些流亡的大专学生不仅把自己所有的东西甚至穿的毛衣都捐献了，为动员商会捐献，学生大都下了跪，《大公报》写文章以《我们都跪下了》为题以宣传，特务们竟造谣说：“这是老冯想的办法来促使学生压制商会，最好你们商会不要献金，看老冯有什么办法？”冯接着说：尽管这样，中国人民还是爱国的多，破坏的是别有用心心的，大家都不是看到听了献金报告后，许多妇女跑回家把多年珍藏的金戒指取来换钢戒指吗（冯先生成都兵工厂做了很多钢铁戒指面刻字“献金救国”，戒内刻有“冯玉祥赠”字样）。有一位老太太送来用布包好缝好的金戒指，尚没拆开就献出来了，这是多么可歌可泣的爱国行动啊！最后冯说：“这是我们几个人在屋里说的心里话，别处可不能乱讲，到处是特务横行。”冯次日即离江津去合江，冯夫人先两天就返重庆了，只是在谷家住了几天。临行时谷夫人还送给冯夫人蓝底白花旧式粗布一块以作纪念。据谷说，冯来时江津县长及各界人士和他们都到码头去欢迎的，下船后住东门外江津县电力公司，次日在江津东门外体育场召开的节约献金救国群众大会，冯做了两小时以上的讲演，在这县住了七天，共发动捐献现金 1300 多万元。

在这里谷还说到一段故事，即冯下船后，走到路上突然来了
一位老年妇女拦住冯跪下大哭喊冤，冯马上将她扶起问其何事？
老妇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数月前被军队抓去当兵，至今毫无音
信，我孤寡一人实在活不下去了，快把我儿子放回来吧！冯听了
就说：“老大娘你别难过，抓你独子去当兵是不对，可是当兵不
是坏事，你看我从十几岁就自愿跑出去当兵，现在当上副委员长
了，将来你儿子抗日救国，也可以当上将军不光荣吗？”说着就
拉着老大娘的手又说：“现在你眼前没有儿子，我就是你的儿子
好吗？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这个儿子就行！”三言两语说得老妇
破啼为笑。冯又嘱随人为老大娘做了适当安排，围观者莫不动
容。谷说冯要求到昆明去发动献金，蒋介石不批准，怕他去鼓动
民主爱国运动，影响了他的独裁卖国。

(姜维翰)

重用知识分子

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在1927年（民国十六年）北伐军渡
过长江，向北方进军的时候，我投笔从戎。先在国民革命军第三
十一军（军长白宝山，副军长李明扬）九十一师（师长李奇峰）
政治部（主任董汉槎）工作。龙潭战役后，三十一军三个师被蒋
介石全部缴械消灭，因而我又转到西北军第九方面军总指挥部工
作（总指挥方振武）。方振武原驻湖北襄樊，后来移驻汉口附近
花园。1928年1月，我因徐州教育界朋友一再相约，仍回徐州
做教育工作。于是请准了假，乘车北上，转回徐州。

路过郑州时，遇着一位由开封来的客人说：“冯总司令到开
封后，军队纪律严明，政治气象一新。”因此，引起了我到开封
参观的动机。这时冯玉祥是国民革命军（原称西北军）第二集团

军总司令兼河南省政府主席。

到开封的第二天早上，正是星期一，我从河南省政府门前走过，恰巧遇见江恒源（向渔）先生。他乡遇故旧，极为高兴（北伐军未到江苏时，江是江苏省教育厅长，那时我是师范校长）。江来河南不久，新任河南省教育厅长。经过叙谈，了解情况后，江劝我留在开封，他说：“你愿在教育厅帮助我，当然欢迎；你如果对军事教育有兴趣，愿到‘教育部’工作，我是可以介绍的……”我听到“教育部”三个字，就很奇怪地问道：“怎么省里还有教育部呢？”江笑着说：“这个‘教育部’不是一般的教育部，它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教育部’，专管军队教育，不管普通教育的‘教育部’。”接着他又说：“最近，冯总司令由江、浙、京、沪一带，聘来不少的教育界人士在这个部里工作。像教育专家陶行知先生、农业专家邹秉文先生、画家许士骐先生等等。还有教育界名流凌冰（济东）、查良创（勉仲）两位先生，就是这个‘教育部’的正副部长。我本人也兼任部里编审处长的职务……”



1925年11月冯玉祥在包头接见著名记者邵飘萍

我所知道的冯玉祥

我经过短时期的考虑后说：“还是到‘教育部’做点军队教育工作吧。西北军的军风纪很好，多学点军队优良作风，以便对青年进行教育……”因此，这就给了我会见鼎鼎大名的冯玉祥的机会了。

我到“教育部”里，大约有十天光景。一天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查良创副部长对我说：“冯先生视察回来了，他约定明早5点钟在省府接见你。”（那时不论军队或政府机关人员都在4点钟起床）。我当时很愕然。查看我的神态很不自然的样子，笑着说：“你不愿意去见总司令吗？”我说：“不是不愿意去见总司令，但是我怕见官，更没有见过大官，见了官没有话讲，去见冯总司令讲什么呢？”查说：“冯先生约你去的，你一定要去。他虽然是一位大官，但他和平常人一个样子，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你一见就知道了。冯先生用人，一般说，中级以上的，他总是要先见见面，谈谈话，才能确定什么职务，发下任命状……”稍停，他又说：“冯先生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不要有任何拘束，青年人要有勇气，说错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称他‘冯先生’，不要称他‘冯总司令’。因为他乐意人称他‘先生’，不喜欢人称他‘总司令’。明早我陪你去，但在冯先生接见你的时候，我就不进去了……”

第二天早上4点多钟的时候，还是满天星斗，北风呼呼地刮着，我和查副部长准时到达省府。随着引导人被领到一所陈设朴素的房内，刚刚坐下，就见从里间走出一位身材高大的人，穿着和士兵一样的灰色棉军服，头戴棉军帽，腰束皮带，腿绑布裹腿，脚穿布鞋。这时我想，这位一定是值班副官，出来招待的。不料引导人在旁就说：“总司令来了！”我随声站起，冯已三步两步走到我的面前了。他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连声说道：“全先生您好，您好！”我应声说道：“冯先生您好！”于是我们对面坐

下。他开头就说：“仝先生来多天了，我没有在家，昨天晚上才回来，很对不起！”接着他说：“听查先生说，仝先生很愿意给我们帮忙，我们很欢迎。请问过去都在哪里做事？做些什么事情？”我答：“我一直是在江苏省教书，都是教小学生和师范生的，其他工作没有做过，最近虽然也到军队中，但是时间太短了，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冯说：“很好，很好，办教育是很好的。我们是粗人，我们是当大兵的。我们军队的生活是很苦的。当老师的人看不惯，更过不惯我们这种生活的。你来多天了，过不惯我们这里的生活吧？”说完哈哈大笑，两眼注视着我，似乎等待我的回答。我说：“教育界同样是苦的，小学教员那就更苦了。我到这里感到生活很好，既有规律，又有朝气，我很高兴过这种朝气蓬勃的生活。只是我的学识浅陋，能力太差，怕的是在冯先生这里做不了什么事情，生活倒是没有问题的。”冯说：“太客气了，我们军队里和一般生活不同，和教育界更不相同。比方说：我们时时刻刻准备行动，说开拔马上就开拔，说住下马上就住下；今天在这里，明天可能到那里；早上在东，晚上可能在西。军队有严格纪律，人人都要遵守，个个都要服从，谁也不能例外的。说到吃饭、穿衣和日常生活，那就太简单了。”我说：“冯先生所说这几点，确乎是和教育界不一样的。但是，也只有时时准备行动，住地经常变动不一样外，其余关于严密纪律、生活简单、行动迅速等等，教育界也要那样才是，这是我们教育界应该学习改正的。”冯说：“还有，不论哪一界，不管什么工作，都是有薪俸的，军队也有一定的饷额。但是，我们这里就不同了。军队中不管军官或士兵，只有饭吃，粗布衣穿，没有发饷的。省府部门从主席、厅长起，一直下去，职务虽然不同，每人每月同样补助20元生活费，‘教育部’工作人员的待遇按省府工作人员待遇，每人每月有20元生活补助费，这一点就有不少的人到这里是过

不惯的。”他说到这里停顿一下，注视着我，我说：“关于这一点，我到开封第一天就听说了，我认为在革命时期，也是应该这样的。”冯说：“噢！先生已听说了，请在这里各方面多了解一下，不对的地方，给我们提出来，我们去改正……”这时我就告辞了。他送我到门口，又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过些时候再谈谈，请先生多多指教！”

这是我第一次会见冯玉祥，时间大约有十几分钟。所谈的内容，一半是他问我的种种情形，一半是他介绍军队的生活习惯等等，也即是在了解我的情况，介绍军队的情况。

第一次会见后，大约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冯又第二次约见我。我仍然是准时到达，准时被接见。开始寒暄几句，冯说：“生活过得惯吗？饭吃得来吗？看出我们的缺点不少吧？多给我们指教了！”我都作了简单的几句正面回答。他又问道：“在这一个多月里，帮助我们做些什么事情？”我说：“没有固定做一项工作，只做点临时性的工作。最近这些日子在报馆印刷部检查与整理（新组织的《中华日报》，每天出对开一大张，是一种普通的社会性日报，是‘教育部’业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冯说：“检查什么？”我答：“《中华日报》是早报，但自从出版以来，总是在午间，有时甚至到傍晚才能印出来，早报变成晚报了……”冯这时便插上说：“这已成为晚报了，到底为什么呢？”我说：“主要原因是排字工人和刻字工人不合作，闹意见；其次，校对人员的校对也不得法。现已逐渐改善，早上8点钟左右可以印出了。”冯于是连连说道：“对的，对的。我们一定要把《中华日报》办好，不光是内容编排好，印刷也要好，还要天明大家都能看到才好，早报到晚上才能印出来，那不是太笑话了吗？请你还要继续帮助他们，一定要在天明印出来……”

这一次的谈话时间短，主要是冯问这问那。我的答话除了对

《中华日报》有关问题说得稍为详细外，其余都是很简单的。这次约见的目的，主要是听听我的反映如何。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又有第三次的约见。时间仍然是早上5点钟。经过两次会见，我深深感到冯是“平易近人”，正如查良创副部长所说：“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因此，我的精神也就不那么紧张了。冯对我也不像前两次那样客客气气。他开口就说：“全先生，你想走也不能让你走了，你一定留在这里，给我们多帮帮忙。查先生说，你很能干，给我们做了不少的事情。《中华日报》的排印出版，你费了很大的力量，整顿得很好。你办教育很有经验，留在这里给我们教大兵吧！”说罢，哈哈大笑。我说：“我很愿意留在冯先生这里，我喜欢过军队的纪律生活。不过，我是当小学教员出身的，对军事教育是个门外汉，什么也不懂得，以后好好地跟冯先生学习吧！”冯这时很严肃地说：“都是一家人，不必客气了。办教育是不容易的，教人难，教士兵更难。士兵大多数是不识字的，因为他们都是穷家的孩子长大的，穷家孩子饭都没得吃，哪还有钱上学呢！我这里的士兵，现在多多少少都认识几个字。我们利用每日三餐的饭前10分钟教他们认字，这是和学校学生的学习不同的。士兵虽然识字不多，书本知识很少；但是，他们东奔西跑，南征北战，见识到的事情却是不少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社会经验是不少的。教小孩子虽然不容易，但怎样讲，他们就怎样听，因为孩子像一张白纸，社会的经验是没有的；当兵的可就不是这样了。所以对士兵们一定要讲得合情合理，合乎一切真实情况；否则，他们就不相信，认为你在说谎话。譬如说，假使有一个人说，他一枪打死了几个敌人的话，在孩子们听了，顶多也不过问上一句：‘到底打死了几个？’也就相信了。但士兵一定要问：‘打死几个敌人，用的什么枪？距离有多远？’”他说到这句话时，笑着说：“我又犯了‘三句话

不离本行’的毛病了。”他接下去说：“教大兵不能用新名词、新术语，一定要简单明白，说出口就听得懂，不加解释，没有曲折，愈通俗愈好，愈粗浅愈好。这样，才能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愿意学，高兴学。有一次，几位大学生来见我，愿意给我们帮忙。我就请他们给士兵讲话，不料他们满口都是新名词、新术语，什么‘积极呀’‘消极呀’等等。他们讲完了，我和他们说，材料很好，意思也很好，可惜他们听不懂。什么是‘积极’？什么是‘消极’？我也不大明白，请你们用通俗的话该怎样讲法呢？他们几个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他们自己还不能通俗的话讲清楚，这些老粗又怎么能懂呢？我想如果这样说：我们遇事要肯干，只向前，不退后，越干越起劲，愈干愈想干，干得好，干得快，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拼上了’，不就容易懂了吗！反过来说，凡是抱着‘混的’就不好了。混一天少一天，混一会少一会，遇事总是得过且过，糊里糊涂地混过就完了，这是骗人家，也是骗自己，这就是甘心落在别人后头的，不也是比较容易懂了吗？”冯说到这里稍稍一停说：“总之，我认为教育士兵一定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要了解士兵的生活；第二，要摸透士兵的心理；第三，要根据士兵的经验。能够掌握这几个特点，那就容易了……”

这次会见，所谈的时间比前两次都长，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对士兵教育的方法。我回去后，当天上午就接到总司令部送来的委任状、胸章、臂章等等。从这天起，我就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教育部”一员了。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冯玉祥三次约见我，谈话的时间虽然都不算长，而涉及的问题却很广泛。而且，每一次谈话都有每一次的中心。从形式上说，第一次以了解我的情况为主体，因为我没有军队的生活习惯，又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因而就把军队的情况和特

点加以介绍和说明；第二次约见距离第一次约见的时间，相距有一个多月，这就是考验时期，谈话时，从各个问题上听取我的反映。这时候，看来他已决定留用并决定了工作。所以，很快的又有第二次的约见，在见面时开口就肯定了，接着就谈工作方法，并且说得很详细。从这一系列的过程看，冯玉祥用人是慎重、严肃而认真的。为了一个像我这样极其普通的工作人员，竟三次接见面谈，从各方面去了解与考验，确非一般军人所能的。当决定留用之后，并立即完成任命手续。也正如他自己所说：“说干就干，说行就行”的迅速、敏捷的作风，这也是他的特点之一。

(全菊圃)

合江亲见

1938年春天，我在西安的东北竞存小学读书，冯玉祥将军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有一次他到西安去视察，闹了一场笑话，这件事很快就在当地传播开了。

西安军政当局事先得到消息，说冯玉祥将乘火车于那天早晨抵达西安。于是，一大群军政要人，还有一大批士兵，一大早就赶到火车站排队恭候，准备热烈欢迎冯。火车进站了，军乐队奏起了乐曲，欢迎的队伍肃立以待。旅客下完了，列车开走了，却始终不见冯的身影，也不见有冯的卫队，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这时，下车的旅客中有一个身材特别高大魁梧，比一般人要超出一个头的人，他普通百姓打扮，走到城门附近道边一个粥摊坐下，压得板凳吱吱作响。这人要了一碗小米粥，一个窝窝头。他大脸盘，粗眉大眼，声音宏亮，带点外乡人口音，卖粥人暗中叫绝，心想，这人要找个出大力的活保准不难，看样子挑扛二三

百斤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这人边吃边问：“今天有什么事，这么热闹？”卖粥人答道：“听说是欢迎一个大官。”客人说：“什么样的大官，要这样兴师动众！”卖粥人说：“听说是冯玉祥将军。”客人说：“冯玉祥也不过是个普通人，何必摆这样大的排场？”卖粥人赶紧说：“先生小声点，莫叫人听见惹麻烦。”客人笑着说：“听见也没什么麻烦，我就是冯玉祥。”

1942年的盛夏，已经是盛传冯玉祥白天打灯笼面见蒋介石条陈社会黑暗之后了。有一位李君，原是冯的旧部，在重庆失业抱蹲，想求冯找个“饭碗”。

李从歌乐山冯住处回到弹子石，对我们说：“冯先生还跟从前一样。”李解释说：“冯先生不喜欢别人称他的官衔，所以大家都这样称呼他。”李接着说：“他还是那样平易近人，很容易见。我虽然只不过在他手下当过一个小连长，可他对我也是很客气的。我进去的时候，冯先生正在和勤务兵一块收拾卫生，他们都轻手轻脚，用脚尖走路。冯先生穿着白衬衣，累得满脸流汗，衬衣也湿透了。”李最后说：“冯先生很认真地听我说完了来意之后，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是啊，我们当军人的不让去打仗，连碗饭都不让吃，现在很多人都在挨饿。”冯停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你看我这个当兵的，现在不是连枪也都没有了吗，有劲没处使，只好拿抹布跟尘垢打仗。”

冯为什么发牢骚呢？原来，蒋介石表面上虽被迫同意抗战，实际上却仍千方百计消灭异己，扩充嫡系，欲达独揽大权的目的。他率领亲信，迁都重庆，龟缩到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重庆的人口剧增，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蒋介石却充耳不闻。冯此时虽已削去军权，自以为尚有发言权，于是在一个大白天打着灯笼，面见蒋介石，准备条陈时局的利害，社会的弊端。他到蒋介石面前才把灯笼吹灭。蒋介石不解地问：“焕章，为什么要这

样？”冯意味深长地说：“外面一片黑暗，只有你这里还有点光明。”冯将军接着谈了当今，特别是重庆的情况，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后方的官吏贪赃枉法，奸商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因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蒋介石听了之后，故作惊讶地说：“竟有这样的事？焕章请放心，我马上亲自去调查，如果情况属实，我一定从严查办！”

蒋介石还真的亲自去调查了，他传口谕第二天要到冠生园去吃饭，目的是看看物价到底涨了没有。侍从官当然理解他的此行意图，于是作了稳妥的安排。结果一顿饭的价钱和抗战初期的差不多，蒋介石当然要对冯反映假情况不满。原来，冠生园就是孔祥熙开的买卖。1943年春夏之交，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阶段。在一片消沉悲观的氛围中，突然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说冯玉祥将军出任献金运动委员会主任，并将亲临合江县。死气沉沉的学校，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人人奔走相告，几乎与世隔绝的桂溪园，一下子又进入了现实。我们国立第十六中学初中分校的200多名师生，一大早就从学校出发，翻山越岭，徒步走了15里，又渡过长江，来到合江县城。

会场设在县城内一个坝子（即空场）上，大会以学生为主，除我们十六中之外，还有国立女子中学和合江县的一所中学，此外还有当地一些工商界人士。会场气氛非常热烈、活跃，情绪也非常高涨，原因之一，恐怕是很多人都想亲眼看一看冯玉祥的“庐山真面目”。最活跃、最兴奋的要数我们十六中和国立女中的同学了，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你这个坏东西》很自然地成了这个大会的主题歌。会场正前方临时用木板搭起一个台子，台面有一人来高，台上两侧放着长条板凳。

冯玉祥将军出现了，会场内顿时沸腾起来，掌声、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简直震耳欲聋。冯和一群当地的乡绅一同步入会

场，从我们面前走过。不用介绍，我们一眼就认出了冯将军，尽管他也是穿着便衣。他那魁梧的身躯、比一般人要高出一个头。他头上戴一顶鸭舌帽，身上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布大衫，衫长到腿肚处，这就越发显得他的身材高大了，脚上穿的是白袜子，黑布面千层底夹鞋，完全是普通百姓的打扮。但是满脸英气，步履矫健，气宇轩昂，实非凡人可比。

冯很有礼貌地把那些乡绅一个一个地扶上竹梯，他最后一个登上台，然后又安排乡绅们就座，这一切都显得文质彬彬，不见有丝毫武将风度。我从记事时起，有好几年都是跟着父亲在军队里度过的，不仅吃、住是在军队里，就连出操、开会父亲也经常带着我，我对军队的生活可以说是熟悉的了。下自士兵、马夫，上至军长、司令，甚至军政部长，我都见过，因而，军人在我的头脑中自然形成了一个概念，归纳成一个字，那就是“粗”。可冯除了他高大魁梧的身材之外，却一点也找不到“粗”的影子。

冯开始讲话了，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动员报告吧。当时没有现代化的扩音设备，旁边的人递给他一个用铁片做的话筒，他谢绝了。我们担心听不清他的话，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往台前凑，这是多余的。冯的嗓音非常宏亮，在露天会场里，虽然有上千的人，但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就连他那带安徽腔的普通话都能分辨得出来。

接着是献金，我们这些流亡学生自然无金可献，有金可献的就是那些坐在台上的乡绅，他们视财如命，要想从他们腰包里往外掏钱，谈何容易。也许是冯想出来的好主意吧，他事先画好一些画，采取义卖的形式。冯把卖画钱全部献给国家；买画者，既捧了冯的场，又落个爱国的好名声。冯画的都是白菜、萝卜、辣椒一类的农作物，朴素雅致，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每幅画上都有题词，题词又多为打油诗，通俗易懂，立意新颖。冯不仅善画，而且善书，他写得一笔好隶书。即使这样，那些乡绅也不肯

轻易认购，他们迟迟不动，我们就唱《你这个坏东西》，有人买下了，我们就报以掌声。

有一方名砚，据宣布是一位爱国者献给冯将军的，冯将军也拿来义卖，要价是法币10万元。经过沉默、口号、歌声、掌声，先后有三个坐在台上的人认购后又献给冯将军。轮到第四个，认购之后就不开腔了，停了一阵，我们又唱起《你这个坏东西》，他才不得不再把砚台献给冯将军。

最有意思的是大会结束时的一个情景，现在犹历历在目。主持人宣布散会，台上的乡绅们，有的手中捧着冯将军义卖的画卷，有的手中空空如也，都端坐在那里等候冯如来时一样欢送下台，谁知冯竟然先走一步而置诸君于不顾。看着台上的土乡绅，我们始而发愣，终于大笑。

(李震)

四川讲演

演 讲

1943年初冬，我们八百多名流亡学生在战区学生中学进修班上学。地址是重庆青木关附近的八庙塘。一天，学校宣布紧急集合，听冯玉祥先生演讲。同学们一时议论开来，有的说：“老蒋的把兄弟，大老粗讲话有什么听头？”有的说：“虽然同是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人，但他是官，咱是民，他和我们不一定是一个调子。”有的说：“他虽是军阀，但治军严明，有‘兆赤’称号，更有爱国心肠。”正在议论中，只见操场里出现几个穿呢子制服的人，那是国民党警卫旅的人。有的轻声说：“特务们腿快，他们倒先来了。”

从青木关到八庙塘是七公里的石板路。上午10点左右，路

上走来两个人，一高一矮，后面跟着几个警卫。校长和主任立刻迎了上去，我们肃然伫立，等着冯的到来。

一阵掌声过后，冯和那个矮个子（据说是国术馆馆长）已经跨上操场的台子。他身材魁梧，没戴帽子，穿一件蓝军布对襟中式棉袄，这袄瘦而长，很有几分乡土气息。六十多岁的人了，仍然面色红润，精神饱满，相貌慈祥，使人感到平易近人。没等校长介绍，他就用浑厚的口音讲了话：



冯玉祥将军在欢迎会上

“同学们，你们喜欢不喜欢听山东小调呀？”用这种方式演讲，同学们觉得很新奇，不约而同地回答：“喜欢！”

于是，他就唱了起来：

“一更里来月正西……”

这是民间的五更调，大意是日本人怎样野蛮残暴地侵略中国，人民怎样遭受灾难。沦陷的大片土地上，尸横遍野，哀号动天；那些背井离乡的人，饥寒交迫，奄奄一息，不堪言状。他的歌声悲怆凄凉，唱着唱着声泪俱下，泣不成声。我们这些学生都是流亡他乡、饱经忧患的人，谁不怀念自己的家乡？谁不怀念沦陷区的父母兄妹？纵使铁石心肠，也会引起共鸣的情绪，无不泪如泉涌，痛哭流涕了。

突然，他高声喊道：

“我们不能老哭了，哭能够把日本鬼子哭跑？我们不能哭，

我们要杀敌！”

立时，大家停止了哭泣，一腔悲愤化成了同仇敌忾。冯又大声问道：“我们宝岛台湾被敌人占据多少年了？”

“48年了！”同学们回答。

“我们的粮食囤子东三省丢了多少年了？”

“12年啦！”

“我们的华北、华中、华南、内蒙呢？”

“丢了五六年啦！”

他愤怒地向桌上击了一掌，接着讲起抗日的道理来。教育大家要卧薪尝胆，鸡鸣起舞，随时准备着为国效力。从开始到结束，除了他那洪亮的声音外，全场鸦雀无声，人人都鼓起了满腔的爱国热忱。我当时也是思绪万千，正如两句古文所言：“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这天，他共讲了6个小时，却毫无倦容。

第二天，他在讲话时，着重勸勉我们要好好上学，再三强调做学问要扎扎实实，在中学要打好基础。又举了好多学习方法，列举了几位古人的学习精神，并且谈到他的一个侄子好高骛远，当时正在国立八中读高二（那时高中是三年制），却想到重庆考大学，要求冯替他“说情”。冯把他训了一顿。但他不听话，自己真的考上了大学，可是第二年就跟不上课了，自己又后悔了。

这第二天的演讲，也是上、下午，足有6个小时。冯善于辞令，深入浅出，古典、掌故运用自如。他的讲话时时为掌声所打断，使人不由自主地热爱他、尊敬他，先前有人对他有不同的看法，都已飞到爪哇国去了。

在演讲的休息时间里，许多听众请他在纪念册上题字留念，他都写上工整的魏体字——“还我山河”，并盖上“冯玉祥印”的图章。也有盖两个的，据说那是因为他们都信奉基督教。

第一天演讲完毕，已经天黑了，他在学校吃过晚饭后才走，回家后发现东西全部被偷。第二天他还照样讲演，谈笑风生，直到天黑才离开我们。事后我们知道了他被盗的事，都觉得奇怪：

“冯先生家里总会有警卫保护的，怎么还有人敢去偷他呢？”

“也许是不抗战的老蒋与抗战的老冯开玩笑吧！”

募 捐

1944年夏，重庆沙坪坝考生特别多。一天上午，我们几个人到南开中学南边水池里洗澡，忽听人说冯玉祥正在大礼堂讲演，我们都喜欢听他讲演，就跑了去。南开中学是有名的贵族学校，这里的学生尽是坐着小轿车上学的公子小姐。我们进入大礼堂时，里面早已坐满了一千多学生和听众。我们只得站在墙边。当时，冯已经讲了半个钟头，身旁站着李德全夫人。我知道他这次是为了“献金救国”而讲演。他先讲了国际形势，接着谈国内战局，讲着讲着他突然问：“我唱一支山东小调，同学们愿意听吗？”听众立刻鼓掌欢迎，记者们纷纷上前拍照。我想他一定又要唱“五更调”了。谁知他唱的是另一支小调，唱词我还记得：

“叫乡党，细听我来讲，我们的东邻舍，有一个小东洋，40年来造枪炮，一心要把中国亡。”

“日本人，不讲理，先占了台湾省，又占了我黑龙江，华北华南也霸去，要把咱中国一口吞。”

“鬼子的队伍虎狼群，杀人放火带掳掠，强暴又残忍，见了那闺女媳妇他就抢，三岁的孩儿，五六十岁的老太太，轮流被奸淫。这大好的河山全破碎，这不共戴天的仇恨，怎能忍？”

“同胞们，快联合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拿枪上火线，组织起来打游击，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他的歌声有高有低，有顿有挫，先是娓娓动听，继而声音沉

重，悲切酸辛，最后又慷慨激昂，振奋人心。一曲未终，义愤填膺，颗颗泪珠，滚落在蓝布制服的胸前，这种壮烈悲恸的真情，感染了全体听众，在场的人都随着哭了起来，那些千金小姐们也忍不住一掬同情之泪了。

唱完了小调，李德全夫人递给冯先生一条毛巾，冯先生一边擦眼泪，一边不时发出呜咽之声。听众们无不热血沸腾，心情激荡。

接着，冯又大讲祖国的可爱，名川大山，名胜古迹，历历如数家珍。从5000年的悠久文明讲到中华民族的不可侮辱。

最后，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今国难当头，就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士兵兄弟们正在前方浴血抗战，生活十分艰苦，我们在后方应该好好做事，好好上学，还应该把节省的钱捐给国家，支援抗战。他举出近年来到自贡、眉山、新津、成都等地发动献金的实例，这些例证都有真名实姓，有的在报纸上已登载。他的讲话，感人至深。在座的纷纷捐献。一位小姐竟把手上的宝石戒指摘下来，交了上去。

这次捐献大多是现金，也有金戒指、手表、西装等贵重物品。有人估计在1000万元以上。

献金的时候，有几位记者和学生向冯请教问题，大多触及时事而又非常尖锐，他一一作答，毫无顾忌。

有位重庆大学的学生问：“冯先生到处宣传献金救国，令人敬佩，但中国的第一个大财神，先生敢不敢向他募捐呢？”

“谁？”

“马寅初教授说的，这……这人在美国的存款有十个零，零前的数字就不必说了。”

事情很明显，大家都知道他不敢指名道姓的是谁。在那特务横行的年代，谁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啊！

冯先生笑着说：“可以，当然可以，我查到是谁，当然要去找他的。”

募捐圆满地结束了。李德全夫人在前，冯先生在后，一起上了小汽车。然而，同学们仍在激动之中。

传奇将军买胡豆

1945年春天，我们几个同学到四川荣昌县城买东西。中午，我们刚拐过南门外汽车站，就见从成都来的公路上驶来一辆黑色小汽车，后面跟着两辆卡车，在进城的街口呆了下来，卡车上下来的都是穿呢子制服的警卫旅卫士，从小车里下来的是冯玉祥和另外一人。

冯衣着还是那样朴实。他与那人走进街西的一家饭馆坐下，要了点泡菜、豆花和辣椒等素菜，两碗毛儿头（蒸的大米饭，碗上面又用茶碗加盖一茶碗米饭），这样的饭都是劳苦大众吃的最普通的饭食，没有一点荤腥，他吃得很香甜。同屋吃饭的人大都点头赞叹：“老冯是国府副主席、军委副委员长，生活却这样简朴，吃得这样简单。”也有个别人说他：“这未免有点过分，难道他在家也吃这种饭吗？”

这时，一个卖胡豆（蚕豆）的小孩子，年纪不过八九岁，赤脚、衣衫褴褛，端着个直径约一尺二三的竹筒箩，去冯面前叫卖。冯把小孩上下看过，便问：

“你为啥子不上学？”

“家穷，没得钱。”

他让小孩吃饭，小孩不吃。他就一面吃饭一面和小孩闲拉。吃罢饭，他接过小孩的箩，让小孩跟着他，往北直向城里走去。好事者也都跟着去看。到了县政府附近的大荣货店（相传为孔祥熙的二小姐所开），冯找着老板问：“我卖你点胡豆好不好？”

老板见是冯玉祥，哪敢怠慢，陪着笑脸答应了。冯就把小孩筐里的胡豆卖给了老板，索取了 1000 块钱，笑嘻嘻地把钱交给了小孩，并拍着她那瘦弱的肩膀说：“回去上学去吧！”

小孩喜出望外地从人群中跑开了。

这件事从头到尾，我们都亲眼所见，观者无不赞美冯玉祥的侠肝义胆。此事颇富喜剧色彩，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陈兴禹)